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Irregular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71 期

目 录

【专稿】

启 之 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民间史学家周孜仁印象

【人物】

刘家驹 董永揭发七仙女
——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自杀真相

张 从 从一张抄家清单说起
——北大历史系学生高海林文革表现小记

何与怀 一位痛苦的清醒者
——纪念王若水先生

【述往】

李豫生 1967.9—1968.7：染血的回忆（上）
——人大两派群众组织割据武斗的 11 个月

【读者来信】

孙言诚 金冲及与高文谦：史料与史观

【本刊声明】

【专稿】

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民间史学家周孜仁

启之

周孜仁，男，1944年4月4日生于成都。1961年考入重庆大学电机系，1966年参加文革造反，任《重大八一五》小报主编。1969年分到云南，在省委办公厅做秘书。1974年被卷入一反革命集团案，贬到云南汽修厂做电工。1981年被破格提拔为工程师。1989年调到深圳任某公司经理，八年后辞职。回昆明后成为无房、无车、无医疗、无退休金的“四无”人士。2017年底开始动笔撰写这部《云南文革史稿》，2019年10月竣稿。全书六十万字，上下两册，由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

—

他爱说话，走路说，吃饭说，坐车说，参观展览时说，看电视时也说。所说大抵三件事，一是时政。香港游行，中美贸易，官场腐败，下层疾苦。二是文艺。王蒙冰雪聪明而精于投机，刘宾雁思想深刻而生性倔强。王蒙的作品透着京油子卫嘴子的圆滑，刘宾雁的文字像个闯关东的硬汉，硬梆梆的，只知道“第二种忠诚”。三是文革。他是在云南省委当过多年大秘，对阎红彦、谭甫仁等封疆大吏的政迹烂熟于心，他亲历四川文革，洞悉五花八门的事件和形形色色的人物。

在他滔滔不绝的时候，我想起了他在回忆录中写到的一个细节——1973年，一个寒冷的冬夜，他为父亲送终，晚辈们抬着沉甸甸的棺木在荒野小道上艰难前行，他跟在棺木后面，竟忧心忡忡地与同行者探讨着林彪叛逃后的中国命运。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革进行到底。”周先生把毛的教导融化到了血液里，落实到了行动上。只不过，他关心的是对文革的反思，他要进行到底的，是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

二

上中小学的时候，周是天才小画家，在家里挨打，在学校获奖。在大学，他是学霸。搞文学，他是高手。如果让他搞电机，三峡水库发电机组的设计师里应该有他的名字。可是，如果让他加入作协，他则兴趣索然——他不想被人豢养，不想参加那个小圈子的游戏。不想像那些人一样，为了出本书，为了得个奖，思想被扭曲，心灵被污染。“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朝代”，“揣着明白装糊涂”；“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拿起笔的第一天，他就把这些格言毫不吝惜地贴在了那些同行的后脑勺上。

他的处女作是长篇小说《狂飚曲》，写的是重庆文革，主角的原型是重庆大学“八一五”的头头吴庆举。吴拿到手稿，欣喜若狂，让人复写了若干份，在重庆疯传。1977年初，吴庆举派心腹将一部最精美的手抄本送交作者。心腹上车前，吴庆举叮嘱他：“记住，一路上就是被人砍了手，砍了脚，也不能把这手稿弄丢！”吴庆举对此书的重视可见一斑。

重视此书的还有重庆市委，公安局立案调查，迅速查明了作者，迅速定下了罪名，并迅速派人到昆明，将那罪证和罪名一同交给云南省委。而就在这个文字狱出笼之际，作者被送进了医院。

那天是1977年7月22日，当晚全厂开大会，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会议结束，他把三岁的儿子放在自行车的大梁上，推着车下汽车厂附近的眠山陡坡。突然，一高度近视，却不肯戴眼镜的青工，车后座上带着女朋友，从坡上飞车而下，狠狠撞到他的右腿上。他被撞倒，孩子也跌落尘埃。当时正是下班时间，在围观者的斥责下，肇事者把他送到云南大学医院（今昆明医大附一院）。

X光片清楚地显示了这个青工造成的后果：他的右腿膝关节腔踝间棘骨折。关节骨折是没法治的。医生告诉肇事者：“你得侍候他一辈子了。”那青工一听，浑身瘫软，与女友齐哭。周先生请他们暂停：“快叫你家人来吧！”青工的父亲和姐姐来到医院，一个老实巴结的平民，一个中学教师。商量的结果，每月给周先生15元营养补助费。

医院不收他住院，他被抬回家。四处求医问诊，终于被一家中医院收留。但是，半个月后，他让人把自己抬回家——跌打损伤膏治不了他的腿。

三

骨头有自愈功能，一般的骨折只要准确复位，用木板、石膏把断裂处固定起来，那些断裂的骨头（医学上叫“层板骨”）就会把周围组织中的微血管戳破，血液在循环中会产生一种酸性物质，这种物质会将断裂骨头的两端软化溶蚀，使之渗透融合，最后结成一体，结合后的骨痂则会被身体吸收。也就是说，要是你的肋骨、腿骨、腓骨骨折而没有位移的话，你根本不用看医生，不用吃药打针，只要老老实实躺上三个月，断骨自然就会长在一起。这是哺乳动物进化出来的一种自我修复的功能。前提是，要得到这种酸性物质，第一要有血管，第二要保证血管中的血液的正常循环。

然而，关节骨折是没法自我修复的。一是关节结构复杂，一旦断裂，就没法准确复位。二是关节腔内除了滑膜、韧带、润滑液、关节囊，剩下的除了骨头，还是骨头。极少血管，血液即缺，循环更难。总之，要让如此贫瘠的土地上分泌出酸性物质，难于上青天。没有酸物，断骨无法自溶自结。因此，一旦遇到关节骨折，医生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患者的情况，将骨折处进行固定处理。如肘关节，就固定为15度。虽然没法弯曲活动，但总可以吃饭写字。膝关节，则根据伤者的职业，固定为45度，失去功能仍可继续工作；如果你的工作是站立进行的，那么，医生会给你的关节固定为15度，基本上可以走路。

周的右腿膝关节贴了半个月膏药，效果显著——肌肉萎缩，腿伸不直了。他找到了一本英国专家所撰《骨折与关节损伤》的专著，熟悉关节骨折的道理，自定了一套治疗方案：关节骨折固定不了位置，至少要让创口接触面大一些，有结合的地方。微血管尽管稀少，也总还是有的。那就要加强腿部的活动，让关节处那些少得可怜的血液循环起来，以产生酸性物质。有了这一套自治方案后，他让工友们把汽车的旧轮胎剪成长长的带子，一头栓在床头上，另一头拴在脚板上，试着在床上让右腿伸直，刚一动弹，就疼得浑身发抖。他咬着牙，屏住呼吸，绷紧每块肌肉，刚刚屈伸了三下，汗水就湿透了衣服，褥子也湿了一大片。

专案组曾认为周为了逃避审查，故意制造了这起车祸，得知他确实卧床不起，才不得不把事情后延。数月后，他的病情稍愈返厂，专案组长找到他，说他写了一本反动小说，宣扬“打倒一切，怀疑一切”。他反问：怀疑的是“四人帮”，打倒的是极左派，请问，我何罪之有？专案组自知理亏，不再纠缠。但他的入党申请也从此划上了休止符。

他从每天三次、四次、五次，直至一千次地屈伸右腿，膝盖里那点可怜的血终于被他感动，一点一点地分泌出酸。三个月后，那点酸性物质终于把断裂的关节粘在了一起。虽然粘得歪七扭八，但总算可以自由弯曲了。又过了三个月，他可以下地走路了。再去拍片，医生告诉他，骨折处的创口只接上了一半，另一半还张着嘴。此后的四十多年，他带着那张着嘴的另一半，下深圳，上京师，返滇赴蜀，办公司，查资料，走访旧雨新知，如果他当初不坚持那貌似绝望的屈伸运动，他的后半生就只能辗转病榻了。

四

波兰导演基耶洛夫拍过一部电影《机遇之歌》，讲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生威特尔在回家的路上，因为巧遇政客、商人和同事，从而有了三种迥异的人生。如果说，这也算是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辨的话，那么生活在毛时代的中国人，只能对之报以哂笑——上山下乡运动一来，中学生都得插队。五七干校一建，机关为之一空。偶然性只能匍伏在必然性的淫威之下。

在极权制度下，规划人生的首先是时代。其次是家庭出身，再次是个体性格。（这个性格不是指脾气禀性，而是指一个人的三观、志趣、意志、以及待人处世的原则）它们组成了一个合力，规定你这一次做什么选择，下一次在那里拐弯，你会看到什么风景，遇到什么祸福，以及与什么人厮守一生。

周先生的一生，被规定了五次。

第一次是文革造反，那时候，他刚刚二十出头。狂热地忠君爱党，坚定地反修防修。但是，他的出身暧昧不清，一直在民族资本家、小商贩和城市贫民之间游走。这使他没法出头露脸，而仅仅担任了重大“八一五”的主编。他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一文，惊动了天庭，得罪了四川二挺（张西挺、刘结挺）。毕业之际，为了避免“二挺”的迫害，拿到分配证后，他连夜逃奔云南保山。

没想到，负责接收报到大学生的军管干部久闻他的大名，强行把他留在了《新保山报》当记者编辑。为了留住他，人家还把他的女友从重庆调到了保山。他的人生，在这里拐了弯。有了第二弯，就有了第三弯——因为他把保山报办得太好，他的文章屡屡高中云南宣传部的榜首，云南省委将他调到昆明，当了省办公厅的秘书。此时的周，家庭团聚，事业有成，前程似锦，令乡党们仰慕之至。

这三个拐弯，都与他的性格——力求卓越出众有大关系。如果不是那篇惊动

毛的社论，他不会分到云南。如果在保山报社，他不争当先进，也不会被省委看中。古人对付乱世的办法是浇菜灌园，功成身退。周不懂这些。他无法忍受平庸，总要有所作为。治世要显才露己，乱世要出类拔萃。假如，他第一次退出重大“八一五”后，就潜心读书，就不会有后面一系列的变故。等到恢复高考，他考研出国。以他的才质，在欧美科技界混出个头脸并非难事。问题是，这种人生，周的才质做得到，感情却做不到。

这涉及到他的性格中另一种致命的东西——热血、心软和轻信。因为热血，他不能不关心批林批孔的矛头所向；因为心软，他不得不接待一个叫金光中的青年军人，听他大侃中国之命运。因为轻信，他把最致命的一封信（关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分析）交给了金。于是，他的命运在1974年出现了大逆转——金光中亲手创建并领导的“中共（马列）特别行动委员会”还没行动，就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周千叮咛万嘱咐让金阅后即焚的信，落在了公安手中。在金光中被捕不久，周即被隔离审查七个月，接着从风光无限的省委大秘，变成了灰头土脸的电工。

五

云南汽车厂是个三千多人的大厂，周在工人中如鱼得水，师付们也没把这位内控的“现反”当外人。年年当先进的日子，又让他的旧病复发——工程师们习惯在设计手册上寻找现成线路单元进行组合，控制程序又笨又烦，他引用布尔代数进行系统逻辑设计，实现了机床控制线路设计的多快好省。人生露出了笑脸，好运向他招手——做报告，发论文，提职称。当年云南机械行业破格提拔了两个工程师，他是其一。

如果顺着这路走下去，他会成为技术大拿，当上高工。如果他再会走走门路，拉拉选票，浮浮上水，弄个工程院院士当当，也未可知。既然他那些专业平常的同学，都能混个人五人六的，他为什么不能？

不是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一条本可以发大财当大官的路——1989年云南计算中心请他南下深圳，接手一家生产“汽车字幕显示器”的企业。这家企业，中心花大钱购买“专利技术”，建立生产线，可一直亏损。中心指望周让企业起死回生，然而，他的命运却由此一落千丈。

经过一番市场调查和实践，周弄清楚了，这家企业的产品对汽车的驾驶安全

毫无作用，从而产品根本不可能有销路。他没有征得领导同意，斗胆停掉生产线，遣散了七大姑八大姨。把组装销售电脑作为公司主业，产品很快就成了市场宠儿，不但扭亏为赢，而且养活了两个公司（包括昆明的一家销售公司）。

为了开展业务，他不得不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八年里，他见识了达官显贵、文人画痞、高人奇士、乡吏厂工、妓女野妇在物质引诱下的失态与疯狂。看到了诚信、真情、仁义、人道在长官意志和资本主义的合作之下，怎样变成了一地鸡毛。在这里，背信弃义成了常规，尔虞我诈成了首选，无良无耻成了发财当官的葵花宝典。“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马克思不知道，“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这里还有中国特色的党天下、官本位和权钱交易。公开的、无耻的、露骨的、六亲不认的拜金主义，在改革开放的掩盖下，成了社会主潮。

“关系是第一生产力”，市长书记，老板经理、白领蓝领，都来找他，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络绎于途。有一次，上小学的儿子周亦丹惊骇地问他：“爸爸，你对他们干吗那么横？”——儿子不能理解，总是和颜悦色的父亲，为什么会突然红头涨脸，大喊大叫，把送礼的赶出家门？

他把送礼的赶出了家门，领导把他赶出了办公室。周停了生产线，蔑视了领导的权威，得罪了计算中心的同事。转营电脑赚了钱，救了公司，等于宣告了领导的失误和无能。而维护权威，保住面子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周妖魔化。于是领导派审计小组来到深圳查他的账，怀疑他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最后，甚至半夜里派人去换掉了他办公室的门锁。

为中心没日没夜打拼，工资与员工一样，年终奖金从来不取。一心为公，到头来却蒙此不白之冤，周愤怒而悲苦：“凉夜迢迢，凉夜迢迢，遥瞻残月，暗度重关，奔走荒郊，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林冲夜奔》的悲愤唱腔，在他胸中一遍又一遍回荡。

渐渐地，怒火凝成了冰水——他明白了：我不适应这种体制和这种环境。他决心靠自己的本事养活全家，让自己活得更精彩，更体面，也更有尊严！林冲告别了天朝，他告别了体制，林冲投奔了梁山，他退回昆明寓所，林冲要用他的武功搏个斗转天回，打杀高俅那厮。他要用手中的笔墨，倾吐胸中垒块，记叙五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乱世出英雄，末世出清流。教育市场化之后，抄剽成风，教授造假，院士拉选票，评奖靠关系。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多数人即使看不惯，也只能与

世沉浮，与人俯仰。“佞谄日炽，刚克消亡。邪夫显进，直士幽藏。”洁身自好者离开官场学府，看重节操者放弃课题职称，世与我而相违，请息交以绝游。仁人志士退守书斋，眼看着起高楼，坐等着楼塌了。而国家仍旧升平，社会仍旧稳定，天安门前的正步走更加整齐划一，历史仿佛仍旧滚滚向前，直到有一天，卸掉了安全阀的高压锅突然爆炸，齐奥塞斯库夫妇像狗一样被乱民打死。

六

很多人，包括我，都有过周的这种感受和打算，但最终还是留在了体制里，一直熬到了退休。像周这样的凤毛麟角。很多人，像周一样，为单位，为朋友可以走门路、拉关系、求人、说好话；但为自己，张不了口。他们还恪守着诚实、谦逊等旧道德。学不会背信弃义，弄虚做假、吹吹拍拍、精致利己的新风尚。很多人，像周一样，相信凭自己的本事，也可以让家人过上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但在体制内，他们都受到排挤，不得烟抽，享受着不同程度的挫败感。

社会变了，他们没变，他们无法顺应急剧变化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他们成了心理学所谓的“不适应”症患者——由于个体不能在既有的社会规范与价值标准下获得满足，所以无法与其生活环境保持和谐。因为不和谐，周付出了无退休金、无医疗保险、无房无车的代价，而这都是源于他的“无档案”——中心为了报复他，毁了他的档案（谎称找不到了）。

两年前，一位昆明的朋友来北京，我向他打听周先生的情况，这位朋友摇头叹息，说他看到周先生就想起陶渊明。都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可人家陶先生还有几亩薄田，农闲的时候，还能邀上几个朋友，喝喝小酒，看看南山。而周先生一年到头笔耕不辍，也换不来几个钱。

我问他，周先生没有退休金吗？那位朋友看看周遭，好像怕人听见：“他一直吃低保，头几年每月几百块钱，最近才长到了一千七（后来周先生告诉我，每月1781元），他住的是妻子单位分的房改房，才48平米。”

我顿时领悟到，他为什么会以顾准为偶像，顾准弃宦场而求真理，历尽坎坷，妻死子离，仍旧每天拖着病体，带几个冷馒头到图书馆去，从古希腊的精神资源中，为中国的未来寻觅出路。我由此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对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充满敬意——法皇路易十四要送给他赏金、荷兰执政官要给他年金，海德堡大学要请他做教授。他都一律婉拒而甘于清贫，宁愿以磨镜片为生。我霍然想起，他

在信中摘引的泰戈尔的诗：“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吧！”

就是在那 48 平米的陋室中，他以一人之力挑战社会。在创办云南老年网络大学的同时，为公益事业出钱出力。在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同时，还兼任着“时代的书记员”。三十年来，他在美国和台湾出版了《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岁月回望录》、《云南文革笔记》。人物传记《刘文典评传》被云南大学校史馆看中，而这部《云南文革史稿》则将走进欧美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他的电脑里还安睡着《流浪深圳》《喋血边城》等几部小说和文论，据编辑说，这些文字都因为“文学性太强”、担心市场不看好为由被出版社委婉退回。

胡适有言：“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周先生有科学家的头脑，艺术家的神思，知识分子的情怀，作为史学家，他传承的是司马迁、刘知几、谈迁、王夫之、陈寅恪这一精神谱系。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汉代党人的风骨，魏晋七贤的高迈，明代清流的操守。

当他抛弃了毛时代的信仰，看透了革命理想的虚伪之后，他仍旧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罗曼罗兰的名言被他题写在书的扉页上：“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他不但靠诚实劳动养家糊口，还把儿子培养成了硅谷的计算机专家。

七

唯一对他心有“不屑”的，是他的妻子。

这是一位 71 岁的知识女性，头发尚黑，脸上光滑白净，体形匀称，如果她不自报家门，你会以为她六十岁。我管她叫孙大姐。孙大姐待人彬彬有礼，说话像朗诵一样悦耳，要不是周先生事先提醒，我根本看不出她曾有过“精神疾患”。

作为人妻，遇到周先生这样老是“闯祸”又不会挣钱的老公，生气抱怨自在情理之中。孙大姐怪他不从俗，整天除了读读读，就是写写写。他们的同学朋友一个个人五人六的，都混出了名堂，只有他越混越抽抽。孙大姐退休金高出老公三倍。精神上难免有些居高临下，发发脾气也算得人之常情。

去年，我见到周先生，小心翼翼地问起此事。当时正值黄昏，我们俩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最后的一抹夕阳穿过竹帘钻进来，在他的蓝衬衫上划上了一条条斑马线。听了我的话，他沉思有顷，缓缓地说：“她因为长期为我担惊受怕，老怀

疑有人要暗害我们，最严重的时候害怕有人投毒，盐不敢吃，连水都不敢喝”他的声音突然喑哑起来：“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她送进医院长期就医。其时适逢儿子要出国留学，医生同意父母一道去北京送别。不料出发前一天，她忽然失踪了，原来，她感觉病兆又现，自己主动回到了医院。医生事后为此事还表扬了她。”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沉默着。大概为了安慰我，他又补了一句：“这么多年，她坚持服药，情况已趋正常，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

太阳没有了，黑暗笼罩着屋子，我开了台灯，周先生突然站起来，有些羞涩地笑着对我说：“苏格拉底说过，如果你娶了一个贤妻良母，那么你就是个幸运的人，否则，你就会成为一个哲学家。”

他没当上哲学家，但却为中国民间史学交出了出色的答卷。❏

【人物】

董永揭发七仙女

——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自杀真相

刘家驹

编者按：坊间网上一直盛传，说扮演董永的王少舫揭发严凤英反对样板戏，严受到批斗，军代表刘万泉勒令她写检讨。严吞安眠药自杀。刘万泉尸检查电台。作者以亲身经历说明了事情的真相——严凤英在擦拭家里供奉的毛泽东磁像的时候，不小心打碎。惊惧恐怕之中，她将碎片包起，扔进了粪池。不幸被王少舫窥见。

文革后，严凤英走上不归路的前因没人敢提及，有人指责军代表缺少人性，其实，当时刘万泉所表现的一切正是我党的本性。刘不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对严的见死不救他持有充分理由：“支左就是搞阶级斗争的，死了阶级敌人，长了革命者的志气。”他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审视一切人的。”

——作者题记

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是1968年4月8日弃世的，这正是文革的火红时期，她死在我们军管的治下。

严凤英37岁就死了，这正是她艺术巅峰时期，由于没有说出死因，读者以为是一般的非正常死亡，显然是误导。

就在严凤英死前的那些天，我正在合肥市郊参加12军的党代会。7日凌晨，电话铃把我叫醒，是老王打来的，他是我们军宣传处的老干事，被派到省革委会文口任军代表，全省的文艺单位都归属他统领。他从电话里急切地告诉我：“严凤英死了。”我吃惊地问：“怎么死的？”“自杀的。”“为什么？”“几句话说不清，回头再告诉你。等主任起床后，你马上向主任通报。”主任是党代会的秘书长，卧室在我楼上，我穿衣起床，来到主任房间，告诉主任：“严凤英自杀了，情况不明，王干事要我向你报告。”主任说：“给我口头说说可以，王干事必须向省的革委会写出文字，一定要清楚责任。死了人，我们支左干部有错，就得承担下来，不要推诿给别人，你马上进城去搞清这件事情的原委。”

军队在安徽的支左干部有6千多人，都是接受双重领导，省革委会管行政和吃喝拉撒睡，部队管思想作风的建设。主任对在第一线的干部，最大的担心是“男女关系”，因和地方杂处，拈花惹草的事频频发生，严重影响我军的声誉；再就是不能执行好“一碗水端平”的政策，支一派，压一派，一旦方向路线出了问题，就会招来中央文革的指责。死人的事天天有，主任倒不十分介意，只是为日后事事都要有个交代，强调我们要留下文字依据。

吃罢早饭，我驱车进城，电影《天仙配》的七仙女的形象一直萦绕在我脑子里，尽管造反派把严凤英整得死去活来，怎么也挥之不去我对她美好的记忆，她当了“牛鬼蛇神”，也想见见，反觉得是一种幸事。一天，我有意去省黄梅剧团大院，说是找军代表，真实的是想看看严凤英。很巧，严从办公楼下来，正好在楼梯口碰见她，她的脸色土黄，突然见了我这个陌生军人，眼神是惊惧的，她的模样再也不是那天真无邪的仙女，倒像个50开外的家庭主妇，这年她才36岁，我和她没说话。我到办公室问军代表刘万泉：“严凤英放出来了？”刘说：“我们开始搞大联合、“三结合”，关了一年的“牛鬼蛇神”都放回家，每天要她来我这里，接受训示。”我问：“你怎么训示？”“她天天来，没话可教训了，就给她读两段毛主席语录。”

我多次见过这种训示的仪式，通常是把“牛鬼蛇神”或“走资派”集合在主席像前请罪，再由军代表数落他们的“老底”。

去年，我刚到合肥，就去市中心四牌楼看群众刷的大字报，大约有七八个专栏是揭批严凤英的，说她反样板戏、反江青。文艺口的造反派都咒骂严凤英是黄梅戏的祖师婆，指责《天仙配》是宣传阶级调和的大毒草，更多的是揭露严凤英生活作风的事。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民间喜欢传播达官伶人的这类事。我半信半疑。

来到老王的住处，这里是省革委会的办公楼，老王就支了张单人床住在办公室的里间，他刚处理了严凤英的事从医院回来，一见我就说：“严凤英一走，省黄梅剧团的P派夹起尾巴了。”他像出了口怨气。搞大联合，剧团的P派群众经常找他闹事，他对这帮人烦透了。

我告诉他，主任让我来问你，严凤英是你管的，她的死，在剧团支左的刘万泉有没有责任？

老王见我是代表组织来，正经起来，讲述了严凤英是怎样死的。

“这事有它的偶然性。”老王先定了调子，然后才给我讲起事件的导因。

文革一开始，严凤英就是众矢之的，大字报批判她天天不断，从今年的三月底到四月初，文口批严凤英升温。那些天，常把她弄上汽车串街走巷的游行，省艺校造反派对她更是轮番围攻批斗，就在这个当口，出了桩怪事。

省黄梅戏剧团宿舍都是筒子楼，没厕所，出恭得到大院西头的公共间。四月三日那天，天刚微明，《天仙配》扮演董永的王书舫拉肚子如厕，拉完刚出门，影影绰绰中见一女人往粪池抛下一包东西，还用一根竹杆往坑里杵了几下，转过身就慌慌张张地跑走了。王书舫注意这人的背影，判定是严凤英，王认为，严凤英是在消灭见不得人的脏物，决定要看个究竟。他找来粪掏子打捞，为了得到隐秘，臭气薰得他几乎窒息也不顾及，费了大劲捞出来的物件是报纸包裹的，他用树枝扒拉开一看，惊呆了，是一座碎了的毛泽东瓷像。这可是犯下了滔天大罪啊！王书舫在剧团是G派观点，和严凤英参与的P派对立，在团又有较好的人气，他虽进了牛棚，G派群众还是准备把他作为革命干部推荐到“三结合”的班子。这包罪物是天赐，就像董永得到七仙女一样，他忙端来一盆水冲洗，原封包好交到军代表办公室。

历史从这里出现了惊人的拐点，热爱七仙女的“董永”，更热爱毛主席，却把“七仙女”做了祭品。

军代表刘万泉是12军住合肥一个团的俱乐部主任，他两眼内视，我们叫他“刘瞎子”，为人倒挺正气的，阶级斗争的思维铸造了他的待人处世。他一口咬

定，严凤英反对江青，反对文革，出于报复心理，蓄意把毛的瓷像打碎扔到茅坑，让他遗臭万年。他招来剧团两派的头头观看罪证，头头们更是义愤填膺，这是大是大非，决定共同组织召开全团大会批斗严凤英。严当即被推上审判台，打倒的口号声、责骂的批判声响彻大院，人人奋起千钧棒，不把严凤英批倒批臭，绝不收兵。

下午，又用一辆大卡车把严凤英拉上了大街。大概是无法也不敢向公众说清严把毛的圣像扔到粪坑的罪行，脖子上依然像过去游街一样，给她挂了双破鞋，向公众昭示她放荡的历史。

游街、批判连续进行了三四天，严凤英有冤无处申，回家就捂住被子哭。她的丈夫王冠亚，原是南京军区话剧团转业下地方的，他俩把这尊像请来后像神龛一样供奉在厅里，严凤英擦拭时不小心碰到地下摔碎的。如是一般的人不慎所为，还情有可原，严凤英是“牛鬼蛇神”，根本无法向群众说清道明，只好自己消灾弭祸，把瓷像的碎片包进旧报纸丢到粪坑里。哪知道，“七仙女”竟然撞上了亲人变冤家的“董永”。

王冠亚左劝右说，都无法止住严凤英的悲愤，她已厌世，没完没了的奇耻大辱该到尽头了。她趁丈夫上厕所离开，写下几句遗言：“-----我严凤英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写罢，从床头柜拿出一瓶安眠药片倒进嘴里，等丈夫回来时，大半瓶安眠药已咽到肚里。

王冠亚发现了，马上报告给军代表。刘万泉处理造反派的事务心存戒备，怕引火烧身，严服毒自杀，他看成是阶级斗争的严重反应，马上带上几个造反派头头来到严凤英家。刘一进门见严躺在床上，就指责她犯了滔天大罪逃避惩罚，自杀是畏罪。几个跟来的造反派头头也发出怒吼，严凤英的卧室像是在开现场批斗会。

在一旁的王冠亚已是忍无可忍，把手伸到军代表面前露出手表说，都11点40啦，快救人吧！

刘万泉这才醒过神来，跑到办公室打电话，要老王来处理。王马上赶到严凤英家，要造反派找车拉严上医院。造反派听说要救反革命，一个个都溜走了。老王从大院里找来一辆平板车，把严扶了上去，老王蹬车，刘万泉在后面推，他们先到市的第一医院，这里黑灯瞎火，没人值班，又拉到市的第二医院，一听说是严凤英，门诊不接收。老王和医生讲理，也说不服他们。严躺在车上一字一顿地说：“你们别为我忙了，我就这样了。”这是她最后的人生留言。

这时，已是凌晨3点了，他俩又蹬车跑向西郊，来到安徽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医生给她灌了半钵高锰酸钾液，严已昏迷，连吐的反应都没有了，老王已束手无策，5时刚过，严凤英就停止了呼吸。

老王要医生解剖尸体，医生拒绝说：“我们是不会为反革命分子留下证据的，听说她身上有梅毒，弄不好会传染给我们的。”

老王像是在给医生下达命令：“我就是要取证，你不动，你就准备承担责任！”

无奈，医生打开了严的腹腔，清肠，洗胃，得到了大半瓶白色积淀物，经化验，确认是安眠药粉剂。（我和严凤英的夫君王冠亚有过沟通，王认定剖腹是查找严腹内的发报机，这显然是荒诞的传言）

为了把问题搞清楚，老王带我去见刘瞎子，走进黄梅剧团大院，造反派正怒不可遏的控诉严凤英的种种罪行，通过大院的高音喇叭传出了他们的讨伐声。刘正在主持大会，老王让他出会场来说话，刘一脸的肃杀来到我跟前讲述了事件的经过，他说的和老王说的一般无二。

我问他：“为什么不赶紧先救人？”

刘理直气壮地说：“我敢救她吗？她是自绝于人民，救她，造反派会指责我阶级立场有问题。不信，你可以听听我们正在开的批判会。”

文革后，严凤英走上不归路的前因没人敢提及，有人指责军代表缺少人性，其实，当时刘万泉所表现的一切正是我党的本性。刘不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对严的见死不救他持有充分理由：“支左就是搞阶级斗争的，死了阶级敌人，长了革命者的志气。”他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审视一切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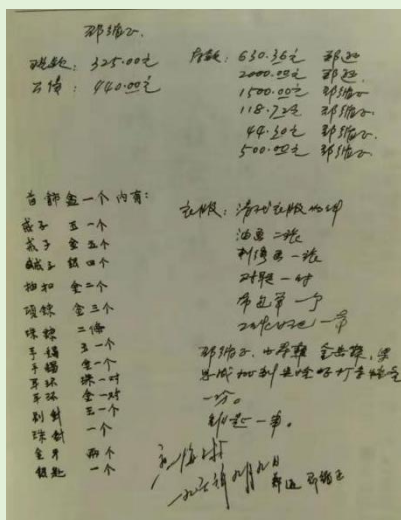
【人物】

从一张抄家清单说起

——北大历史系学生高海林文革表现小记

张从

邵循正先生（1909年—1973年），字心恒，福州人，著名历史学家，毕业于清华大学，曾留学法国，历任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蒙元史方面有专长。2019年11月，邵循正先生的女公子邵瑜赠送笔者一本她著的《心恒先生轶事》，书中附有一张抄家清单，见下图：



经辨认，该清单记载抄家物品如下：

现款：325 元，公债：440 元；存款 6 笔：分别为 630.36 元，2000 元，1500 元，118.72 元，44.30 元，500 元，共计 4793.38 元。

首饰盒一个，内有：玉戒指 1 个，金戒指 5 个，银戒指 4 个，金抽扣（纽扣？）2 个，金项链 3 条，珠链 2 条，玉手镯 2 个，金手镯 1 个，金耳环 1 对，珠耳环 1 对，玉别针 1 个，珠针 1 个，金牙 2 个，银匙 1 个。

清代衣服 2 件。油画 2 张。刺绣画 1 张。对联 1 副。布包单 1 个。工作日记 1 本。邵循正、白寿彝、金岳霖、梁思成批判吴晗的打字稿各 1 份。钥匙一串。

清单下面有抄家人高海林签字和郑逊（邵循正夫人）和邵循正的名字。抄家时间是 1966 年 9 月 9 日。从清单字体上辨认，有两人的笔迹，首饰盒一个内有物品和郑逊、邵循正名字为一人字体，应是郑逊的笔迹，其余现款、存款和衣服等及高海林签字与时间应为高海林笔迹。在《心恒先生轶事》中，邵瑜写到：

文革开始时父亲正生病，在北京医院住院。母亲每天进城去看他，把学校里的事告诉他，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运动要怎样发展。8 月中，他出院回来，看见许多亲友都被批斗、抄家，倒为自己还没轮上而深感不安，每天晚上听着高音喇叭里净是点老朋友名的通令，常常自言自语“怎么还没有我？”1966 年 9 月 9 日下午有人砰砰地砸门了，父亲一跃而起，笑着对我说“好了，好了，他们来了。”红卫兵先把家里的东西抄检查封了，天快黑时，让我和母亲只许呆在厨房里，把父亲关在屋里审问，拍桌子和审讯的高声与父亲平静回答的低声形成鲜明对比。母亲担心父亲久病初愈的身体，又怕父亲被打，十分焦急。倒是父亲乘取东西的机会，匆匆拐到厨房门口，小声安慰母亲说：“不要着急，再对付一下他们就走了。”（邵瑜《心恒先生轶事》，世界日报读者丛书，2012 年出版，71 页）

笔者问过邵瑜，这些被抄的物品后来归还了吗？她说：只有现款和存款文革后归还了，其他物品都没有归还。

这个带队抄家的高海林又是何许人也？据北大生物系 63 级校友樊立勤说，

高海林和他是同乡，是北京郊区密云县（现为密云区）农村人，1964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北大历史系。文革开始后，高海林积极地给教师同学写大字报，批斗教师，组织了名为“炮兵营”的战斗队，自命为营长，手执长矛，带队抄历史系干部教师的家，据周一良之子周启博对笔者说，高海林带队抄家不下10多处。

1966年9月27日后，高海林又到了位于昌平太平庄的历史系劳改队，负责监管教师劳改。在郝斌先生所著的《流水何曾洗是非》一书中，有多处提到高海林，其中在“断崖夜斗杨人梗”一章，有着如下描述：

高海林让杨先生站在崖边，背朝外，脸朝里，我们围成半个圈子，高说：“你交代了，我放你回去，你嘴硬，我把你推下去！”崖是土崖，虽不算深也有十几米。杨先生的一把骨头经得起他一推吗？

高海林自监管我们以来，断断续续也有个把月了。喝骂动手是常事不说，他与别的监管者又有不同，做起事来，实在没深没浅，用北京话说，他是个“二百五——半疯”。想想，在这旷野荒郊牛鬼蛇神众多的地方，他一个人就敢开批斗会，还让众黑帮作陪，这本身不就是一件常人做不出来的是吗？

高海林所说的“你嘴硬，我把你推下去！”这句话在我们听来是威吓，可谁也不准他真的把手一伸，那么，这燕山脚下，说不定就会弄出一场骨折魂销的惨剧，太平庄成为杨先生的大归之地，也都是难料之事。（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香港，大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89-90页）

郝斌还写到，在太平庄的一次座谈中，向达先生说：“我这次出来，跟老伴交代过了，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搬到燕生（向达之子）那儿去。所以，我到了这里，没有什么牵挂，能跟大家一块儿安心学习。”向先生刚说到这里，高海林已经跳了起来，喝令向先生站立、低头、弯腰，大骂他“抵制监管，反攻倒算！”（同上，77页）

这位炮兵营长不仅“武斗”在行，也具有一些“文斗”的本领。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一书中有一题目为“《乞活考》招来灾难”的短文，其中写道：

《乞活考》是在1948年底、1949年初完成的一篇论文。乞活是西晋末年一部分流民的称号，他们在五胡占领中原后，据守黄河南北，成为缓冲地带。他们抗击北方胡人政权，与东晋北伐军时有联系，心向南方。他们聚族

而居，父死子继，是一支存在了几十年的武装力量。文革中历史系的一位教师和一个红卫兵，抓住《乞活考》大做文章，硬说此文乃为蒋政权出谋划策的‘大毒草’，对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肆批斗……对这张离奇可笑荒诞无稽的文字狱罪，我当然绝不承认”（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118-119页）

这个借《乞活考》一文写大字报并批斗周先生的红卫兵，就是高海林。1998年年初，北大百年校庆将至，历史系散在各地的64级学生，已经工作了整30年，每人各就自己的专业写了一篇文章，结集成书，推代表来商请时任系主任的周先生为他们作序。周先生一看文集中有高海林的名字，脱口便对来说：“这个红卫兵在运动当中对我的迫害，其态度之凶恶、手段之粗暴，我是至今难忘。尤其奇怪的是，直到1968年的下半年，炮兵营营长还带着他的军师——一名历史系的教师，来到劳改大院，一再强迫我承认《乞活考》的反革命意图，说我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我当然坚决予以否认。请你们告诉他，我至今不能谅解。但是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就搅坏了一锅汤，我仍旧要给你们写序，以示鼓励。”而隔了两个月，周先生的态度忽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说，“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之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接下来周先生这样说：“我与红卫兵的情况只是上当受骗的程度不同，又有什么理由坚持不肯谅解呢？因此，我在这里向原新北大公社炮兵营战斗队的高海林营长喊话：让我们学习鲁迅所说的相逢一下泯恩仇吧！

周一良先生喊话时已经是85岁的老人，他的话显示了他的理性和宽厚，无奈高海林和他的“军师（北大历史系某教师）”，一个在河南，一个在北京，谁都没有给周先生一点回应，直到老人家离开这个世界！²

那么高海林在文革后真的就没有一点忏悔之意吗？笔者在2019年11月份遇到了高海林的一位大学同班同学，他和高海林文革时是同一个群众组织的，他说：高海林毕业后分到河南，后在河南大学任教，在世界史的教学科研方面颇有成绩，该校的学生对他也评价也不错，但他刻意回避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不参加母校的有关活动，他曾对这位同学说自己“有些像二次大战后的纳粹分子”，对文革时期那样对待自己的老师，也心生悔意。另据一位当年高海林的老师说：高海林曾向他表示过，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为有所悔恨，但当时是“真心相信他们都是反革命”。

回顾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些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勇敢分子，高海林就是文革中一个积极活跃的，在前面充分陷阵的勇敢分子，在运动过后，他们也就被抛在一边，无人理睬了，因此他们也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如果他们能够认真反思，认识到自己犯的错误，勇敢地向被害者道歉忏悔，那些被害者及其家属也会原谅他们。邵循正先生的女儿邵瑜就向笔者说过：如果高海林能向她和其他北大历史系的老师及家属道歉，他们也会原谅他的。遗憾的是：高海林在前几年突发心脏病去世，没有机会再进行道歉了。

高海林虽然已经去世了，但类似高海林这样在文革中曾经伤害过自己老师和同学的人还有不少在世，他们中有些已经深刻地忏悔，向被害者真诚地道歉，也得到了被害者的原谅；但也还有很多人没有向受害者道歉，其中有些是不愿意道歉，有些是没有勇气道歉，因此，他们也就得不到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原谅。在北京高校和中学，文革中的害人者向被害者道歉，得到被害者宽容原谅的事例很多，也促进了文革中的两派捐弃前嫌，共同反思。但也有些曾经掌权的造反派头头和武斗打手在文革中迫害对立面的群众很厉害，却至死不愿意忏悔道歉，甚至在回忆录中极力为自己开脱，他（她）们自然就得不到群众的谅解，原两派的群众的和解也因此受到影响，至今留下抹不去的痕迹。

希望那些还活着的高海林们，能够在余生里认真反思自己的文革中的表现，勇敢地站出来，向曾经被自己伤害过的老师、同学或其家属忏悔道歉，求得他们的原谅，也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但愿这不仅仅是笔者的一点良好的愿望。❏

【人 物】

一位痛苦的清醒者

——纪念王若水先生

何与怀

“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新的觉悟、新的启蒙运动。这是因五四运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我们今天又需要启“党文化”之蒙……”

——王若水

一九八三年秋天，很出乎许多人的意外，中国大陆突然来势汹汹地开展了一场“清污”即清除所谓“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当时，我正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英美文学硕士班进修。新西兰地靠南极，远离世界的喧嚣，平静而又美丽，可称之为世外桃源。可是，我这个来自赤县神州的海外学人，心头却难以平静。许多夜晚，万籁俱寂，月白风清，我却思绪不宁，举目遥望，好像看到万里之外的祖国。文革结束不过几年，十年惨烈的灾难，不是还历历在目吗？这还不够吗？还一定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不成？！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定报读博士学位，而且，几经考虑之后，完全改变了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了我的博士论文课题。理所当然，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是要涉及的重要方面；而几年前我已开始关注的王若水等人，便变成我要评论的重要角色。

但是我见到王若水本人已经是几乎二十年之后。只有一次接触，而且只是短短的两三天开会期间。那是2000年12月中旬在香港大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在这之前，一九九六年九月上旬，我在云南昆明见到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吉先生，在闲谈时我问起有关1983年“清污”运动和王若水的异化观点，他淡淡地说，王若水没有什么错，只是讲得太早了。“讲得太早”！这便厄运临头？！应该说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吧？真是似乎命中注定，王若水又是一个悲剧人物。

在那次香港大学的研讨会上，有一个几分钟的小小的插曲——王若水的论文是《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宣讲之后，一个来自北京大学，被认为“新左派”的年轻教授立时盛气凌人地问难，训斥王的论文缺乏学术规范，不过是些“sentimental”而且“outdated”的言说（研讨会的语言是英语）。王若水没有怎样回答。我不安地注视着他。我知道他不久前因为肺癌开过刀，虽然他对我说过手术效果还好，但一看就感到他身体并不好。他面容清癯，经常带着几分内向甚至忧郁的微笑，尊敬他的人如我者，会看到其中有掩隐不住的哲思，但此刻看到的分明更是一股悲戚与苦涩。事后我隐约感到，这好像是象征性的一幕：王若水不属于这个时代；他领导潮流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只不过一年之后，2000年1月9日凌晨三点十分，王若水的心脏在睡梦中停止了跳动。这位痛苦而清醒者的智者，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家、前中共中央《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终于因肺癌在美国波士顿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五岁。

一、领导潮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

“人道主义热”和“社会主义异化热”中的王若水

王若水最得心应手也最光辉的岁月可能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几年了。文革结束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整个中国大陆掀起了“人道主义热”，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流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而在思想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王若水谈得最多，名气也最大。

这个热潮从一开始，人道主义的讨论就和异化问题联系了起来，甚至当时事实上异化问题还要比人道主义问题提得早一些。虽然异化问题是人道主义讨论应有之义，但这多少还是有点令人惊奇——毕竟，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公众包括党政领导来说，“异化”是个新鲜概念。也许事出偶然。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汝信办《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向王若水索稿。他记得王若水在一九六三年参加起草周扬牵头的批判人道主义的小册子时写过“异化”这一章，建议王把这篇旧稿拿出来发表。王若水从柜子里翻出这篇稿子，看了一遍，觉得还可以，只删去文末一段，就交给汝信，在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的集刊登了出来，题目为《关于“异化”的概念》。这个杂志专业性很强，读者不多，然而这篇文章还是受到了较大的注意。《新华文摘》予以转载；有的报纸作了报道。

王若水在很长时间里就想向中国公众介绍“异化”这个概念，希望这个概念普及起来，但又担心它不够通俗，不容易被公众接受。一九八零年六月，王若水又得到一个偶然的遂愿机会——他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讲演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听众中有人递条子说，美国教授给他们讲课，讲到了异化，他们听不懂，希望王若水解释一下。

王若水回答时，从现实生活中举例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意识形态的，如个人迷信；政治的，如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经济的，如盲目建设、片面追求高速度和发展重工业，结果成了包袱，还有环境污染等等。批判个人迷信有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现成方法。王若水指出，所谓“个人迷信”，就是把人民群众和领袖的关系颠倒了，人们把领袖神化，到头来领袖成为一种不能控制的力量，反过来使人民受苦。王若水还相当超前地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

王若水曾经这样解释异化：“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

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周扬在一九六三年那个曾经受到毛泽东欣赏的报告中，就是采用王若水这个学术性的解释。王若水也把这个解释写进一年半前发表的《关于“异化”的概念》一文中。这次讲话，他换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母亲生下并养育了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却变成了逆子，反过来虐待母亲。这就是异化。

事后，这一段录音被整理，以《谈谈异化问题》为题，在《新闻战线》一九八零年第八期上发表，继而被不少报刊转载，产生很大的影响。有人把录音带借给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后来王若水得知，胡德平说，他们全家都听了，很感兴趣（所谓“全家”，自然包括胡耀邦）。王若水几天后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讲了一次，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王若水发现，人们对“异化”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显然，这是因为它能够对现实中的许多问题给以比较深刻的解释。

一九八零年，王若水又发表了《文艺与人的异化问题》，提出文艺应当描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异化并对此提出抗议，为随后出现的“异化文学”鸣锣开道。同年十月，在天津召开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上，王若水被邀请做了发言。王在发言中对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的关系做了说明。

那一年人民出版社准备编一本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集，向王若水约稿，王应约写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本文集在一九八一年初出版）。王若水写作此文显然企图切中“要害”。多少年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实际上是把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因而“以阶级斗争为纲”，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们把人纳入了阶级的框架，以人的特殊性（阶级性）来否定人的一般性。因而，用王若水的话来说，在中国出现了一种藐视人的“冷冰冰的马克思主义”。一九八二年春，王若水应《中国青年》杂志之约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其中也是强调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文汇报》在“争鸣”版上发表了王若水早在一九八二年夏天就着手写的《为人道主义辩护》。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对中国的现实意义包括：它意味着坚决抛弃十年内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领袖神化而把民众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它意味着反对封建的等级和特权观念，反对资本主义的拜金思想，反对把人当作商品和单纯的工具，它要求真正把人当人看，并且从一个人的本身而不是从他的出身、职位或财产去衡量他的价值。

王若水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应异常强烈，对那时已有一些冷却下来的人道主

义讨论起了重新升温的作用。朱光潜也给王若水写来一封信，表示很赞成文中观点。当时适逢《人民日报》报社召开记者年会，从各地来的与会者要求人手一份。王若水让印刷厂打印了一百份，除了给记者部分发之外，又把六十份送给了正在进行的“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人道主义讨论会”，作为向这个会议提交的论文。有趣的是，这个中宣部文艺局授意召开的会，其目的本来是想批评一下人道主义，但批不起来；而这篇论文在会上散发后，气氛更加变了。的确，王若水这篇长文，“俨然是一篇人道主义的宣言和挑战书”。

从一九八零到一九八二年的三年间，有关“人”的问题的讨论文章在中国大陆各地发表了四百多篇，包括探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异化、人性等等。文艺界和教育界也召开了人道主义的讨论会。人民出版社在此期间出版了两本论文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关于人的学说的探讨》。顺便指出，在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这个最要害观点的人还不是王若水，而是当时一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高尔泰。他早在一九七九年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异化辨义》《异化现象近观》和《异化及其历史考察》，详尽地考查了异化概念并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高尔泰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在集中营里备受折磨，幸免于死。他对异化的批判更加激愤。不过，由于党内职务和资历因素，王若水影响更大。正是在王若水等人的推动下，一股“人道主义热”和“社会主义异化热”掀起来了；而周扬在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作的、王若水也参与起草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标志这股热潮达到最高峰。

二、毛泽东让他大起大落

——文革前与文革中的王若水

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王若水也曾有过一些风光的时候。这是另一种“风光”。以李慎之的话说，他是极少数有幸姓上达天听，又蒙天语嘉奖，然后声名播于天下的人。（李慎之，《呜呼王若水魂兮归来》，网站文章）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就发现了王若水。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某天，《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给王若水布置一个紧急任务，要他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王用一天的时间赶了出来，题为《清除胡适的

反动哲学遗毒》，很快发表了。后来王若水得知，批判胡适是毛泽东的指示，毛看了他的文章，说他也是“新生力量”。王若水在文章里写道，批判胡适，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说自己也受到启发。王若水又接连写了两篇，毛也看了，并对第三篇特别表示欣赏。后来这篇文章被推荐为干部学习参考资料之一。

一九五七年四月，王若水以《人民日报》理论组的编辑身份，撰写了一篇社论，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题目为《大胆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人民日报》有关社论的第一篇，胡乔木修改后，发表在当月十日《人民日报》上。显然，胡是前一天受毛责备后，才立即布置撰写并发表上述社论的。（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2002年，页267）十日当天，毛泽东就把《人民日报》的编委叫去了，问：这篇社论是谁写的？邓拓回答说：是王若水写的。毛泽东就说：让王若水也来。毛对此文显然颇为赏识，还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页77）毛两年多前看过王若水批判胡适的文章，对其名字有印象。

这是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毛泽东。他们到毛的住处后，毛把写社论的功劳归于王若水，大加表扬，同时狠狠地批评了邓拓，说邓拓没有很好地宣传“双百方针”。那一次毛泽东发了很大的脾气，甚至令人大惑不解地说邓拓像汉文帝。据说毛决定撤掉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一职时，曾想过由王若水取代。

又过了几年，一九六三年，王若水受马克思《哲学手稿》的影响，写了《桌子的哲学》那篇文章，毛泽东看了以后也表扬了一番。

如前文所说，这年王若水还有一个出色的表现。当时中共中央有计划地批判苏联的所谓现代修正主义，拟出了一些题目，其中有一个题目是批判人道主义，负责这一个课题的是周扬。周扬就找了一些人，其中包括王若水。在写作分工时，王被分配写“人性”和“异化”这两章。周扬这篇文章，特别内中所谈的“异化”问题，为毛泽东高度赞赏。

由于这个背景，王若水在文革前期可谓春风得意。当时，《人民日报》的人员分成两派，王若水成了其中一派的骨干分子。究竟是受过毛表扬的人，因此他可以贴大字报而不用担心打击报复，多年来的那种压抑感没有了，甚至自以为在参与什么伟大的事业。许多年之后，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王若水这样反思那时的自己：

我觉得自己解放了，我完全没有认识到我正在经历一种新的形式的“异化”。代替压抑感的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感情。我对毛是“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我确信毛是在领导我们进行一场惊天动地，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要涤荡旧世界的一切污泥浊水，建立一个红彤彤的崭新世界。（王若水，《没有结束的求索》）

但是，天意从来高难测。王若水不久就栽了一个大跟头，就是栽在毛的手上。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管《人民日报》。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周指示《人民日报》应该批极左思潮，批林彪的“左”。当时已经被起用为“看大样组”（共六个人，几乎相当报社领导班子）成员的王若水，完全赞成周的指示。可是，张春桥、姚文元跑来又讲了一通，意思是批左不要批过了头，让报社许多人都想不通——刚刚要开始批左，为什么就强调“不要过头”？王若水更觉得不能听张、姚的，乘这两个人去了上海的机会，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在理论版以整版篇幅编发了三篇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文章。张、姚为此大为恼火。在这种情况下，王若水于十二月五日索性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告了张、姚一状。信上说：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

没想到这封信惹来一场大祸——实际上，张春桥他们讲的正是毛的意见。

这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对他们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毛进一步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彪）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过后第三天，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精神。周恩来处境尴尬，讲话语调是温和的。轮到张、江、姚讲话就放炮了。江青指责王若水这封信“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分裂中央”；张春桥斥责王“极右”；姚文元质问：“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气氛变得很紧张。

接着就开始批斗王若水，从一九七三年到七四年，是《人民日报》内部声势最大的一次运动。王若水被批斗得头发也脱了，背也驼了，后来又被定为敌我矛

盾，送往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劳改。对许多人来说，那打击简直就是千钧压顶，沉重得难以承担。报社都担心王若水会自杀。但他却仍然能够故意示威似地在大字报巷子里走过，一派蔑视的气概。王若水对朋友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没有痛苦的糊涂人。”他感到有一种力量支持着他，是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中正确的东西在支持着他。他百分之百相信自己没有错。这种感觉甚至是他过去从来没有的。

一九七六年文革一结束，王若水从干校回到报社，第二年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主要分管理论、文艺、社论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那几年，《人民日报》的社长是胡绩伟，在胡、王等一些开明党人的领导下，《人民日报》经历它有史以来的最好的时期，销量空前高，破历史记录。报纸配合拨乱反正，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都是纠正文革错误的，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很大。当时中国大陆有一个流行说法：“人民上天，红旗落地”（“人民”指《人民日报》；“红旗”指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大谈特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自然不同凡响。

三、导火线：王若水遭遇最严重的打击

但是，好景不长。一九八三年，正是由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导致一场全国性的“清污”运动，而王若水则遭遇他生命中最严重的打击。这似乎突然但实属必然——在中共某些领导人看来，王若水虽然“风光”一时，但绝非正统，不过是贩卖一些异端邪说，也绝难得逞。

这年三月十六日，周扬九天之前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所做的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演讲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接着发生一场举世皆知的轩然大波。

《人民日报》发表周文的当天上午，中宣部长邓力群先打电话给秦川总编辑，接着找王若水。他对王说：乔木同志已明白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们为何不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你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你当面听了乔木同志三月十日的谈话，对这一点应当知道得很清楚。

邓力群所指的是中共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三月十日从所住的医院来到周扬家中当面对周扬的谈话。王若水被叫去参加，一同参加的还有夏衍、贺敬之、郁

文等。王若水对邓力群承认，在发表前未请示胡乔木是错误的，但根据自己对这次谈话作的笔记，对所谓“不能发表”这一点却毫无所知。

王记得，胡乔木整个谈话，时间很长，也很杂乱无章，但听来比预料还要温和。王若水最担心胡乔木批评异化概念，但是他只字未提。胡乔木对周扬还很客气（在大门口告别时，胡乔木对周扬行九十度鞠躬），对王若水也有些客气，没有把他的不满完全说出来，还在批评之后又讲了两句过奖的话，大概是希望王若水改了就好（这是他讲话的风格，不了解这一点就会产生误解）。秦川原先曾打电话给邓力群，说《人民日报》打算发表周扬文章，征求他的意见。邓说，他没有把握，要秦川请示胡乔木。经过胡的三月十日的谈话后，王若水他们自认为知道胡乔木的意见了。

后来王若水才知道，胡乔木回到医院后，在当天下午曾打电话给郁文，补充了他对异化问题的看法。郁文的记录是：

关于异化的问题我忘记谈了。我想马克思早期说的异化和晚期说的不一定一样。不管一样不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将它应用过来，不加区别，不对。用这个名词要加以区别。如果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有非人道现象，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道现象混在一起，就把问题谈乱了。一个是非基本的现象，甚至是非法的；一个是基本的现象。我这个意见将另外写信告诉他们。如有关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把这个意见补充上。

那么，在三月十日，当谈话中周扬问胡乔木意见时，他为什么不回答呢？王若水认为，胡乔木说“忘记谈了”其实是托词。他大概是回医院后又找了一些书来看，这才发表了上面的意见。当然这是临时抱佛脚提出的，但他既然是领导，别人就必须奉为指示了。

但更严重的是，按邓力群的说法，胡乔木早在三月八日就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随后，邓叫中宣部送了一份电话记录给《人民日报》，那是九日胡乔木打给郁文的电话。其中包括如下几个要点：

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

暗示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

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目的何在？……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

这个电话的调子口气很严峻。王若水他们如果事先知道这个电话，肯定不会发表周扬的讲话。而胡乔木三月十日那次谈话，在王若水听来，是说了让周扬修改一下讲稿，但说得很委婉，并没有说不能发表。但从这个电话看来，王若水推测，胡乔木那天专程来和周扬谈话，是想让周扬知难而退，主动撤销发表。胡乔木在心底里连周扬讲人道主义的动机都怀疑，这使王若水非常惊讶。

不过，王若水发觉这一点已经为时太晚了。

三月二十六日，中宣部开会，由胡乔木主持，通知周扬、秦川和王若水参加。胡乔木说，关于《人民日报》犯错误的问题，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提出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已经得到中央同意，但还要征求三位同志的意见。

接着，就由邓力群宣读这个报告，其中批评了周扬和秦川，重点是批评王若水。王若水被指责企图利用周扬的威信，把自己的观点变成权威的观点。《报告》在最后提出：把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这个会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发生了一场火爆的争吵。秦川这样回忆：

周扬听着听着，突然把《报告》往桌子上一摔，大声斥责：“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周扬对面的胡乔木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震惊了，用更大的声音反问周扬：“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更加愤怒：“你们这样不正派！”

“你这不是说我，是说中央政治局不正派！”胡乔木的语调十分严厉。

“你不要扣帽子，我是说你这个具体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扬没有退让。

十六年之后，也是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凌志军和马立诚合作出了一本书，对这一事件作了一个评论。他们问道：胡乔木是否有权利禁止周扬发表他的文章？就算胡乔木说过“不要发表”的话乃是属实，难道就能作为周扬犯了错误的凭证？这两位党中央的喉舌工作的作者显然是故意发问。他们当然知道，正如

他们自己在书里也说，“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胡乔木的行为仍然有着某些必然的根据，这依据还需在我们国家既成的制度和观念中寻找。”

正是由于这些“必然的根据”，周扬被迫退让了。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六日，中国大陆各报发表了新华社前一日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个特意安排的谈话中，周扬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不久，周扬病倒住院。他念念不忘的是他受批判的事。他更想着继续做研究。他对去看他的王若水说：“若水，什么时候我们再搞一搞异化问题吧。”

一九八五年元旦，王若水又去北京医院看望周扬。现在他几乎不能说话。他紧紧握住王的手不放，要掉眼泪的样子。这是诀别的表示。看来他想到上次对王提到的希望无法实现了。王若水安慰地说：“周扬同志，你放心吧！还有我呢。”

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周扬游丝般的气息停止了。第二天早晨中央电台新闻联播，最后一条消息，仅有一句话：文艺理论家周扬昨天在北京因病逝世。

至于王若水，他于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午，和《人民日报》其它领导人员一起，被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书记处的成员除胡耀邦以外都在场，加上中纪委书记王鹤寿和组织部长陈野萍。

胡启立向王若水他们宣布书记处十月二十日的决定：同意胡绩伟辞去社长的请求；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他们两人都调离人民日报，但目前要留在人民日报参加整党接受批评；任命原总编辑秦川任社长，原副总编辑李庄为总编辑。

王若水早就预料有一天他将被迫摊牌，和党组织正面冲突；王若水只是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来。现在来得早了一些，这是王若水不愿看到的，但没有办法。

四、流产的“清污”运动：“二十八天的宫廷政变”

胡乔木、邓力群搬倒周扬并惩罚《人民日报》的计划，包括对王若水的严厉的处理，其过程竟然同时是一场影响整个中国大陆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清污”运动；而这场“清污”运动又包含着一个妄图搬倒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阴谋——被史家称之为“二十八天的流产的宫廷政变”。

起初，胡乔木、邓力群向王若水等人宣称得到中央同意的处理报告其实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进展得并不顺利。当时胡耀邦要出国访问，他说等他回来后找王若

水谈，但后来也没有找。显然，胡耀邦有意想把事情压下来。邓力群二零零六年在香港出版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香港大风出版社）一书中也说，他们于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日把一个月前曾经上报、现在修改过的报告以及其它材料再次报送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后就没有了消息，有点“留中不发”的味道。后来，胡耀邦和他讲，学术问题，何必搞得那么紧张，各说各的都可以嘛。他邓力群就回说：周扬那篇东西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按周扬说，党要变质，党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政权也是如此，经济、思想也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把马克思主义讲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照搬过来，这不伦不类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但胡耀邦一直坚持这是个学术问题，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事情几个月没有下文。

于是胡乔木和邓力群决定绕过书记处，直接找邓小平。大概这个时间（可能五月份），周扬也托薄一波给邓小平送了十八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

史家一般认为，邓小平当时终于接受了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建议，在即将到来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精神污染”的问题。邓力群在他的《自述》一书中，也承认邓小平八月份找胡乔木谈了一次话，是缘起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文艺界的问题复杂，思想界的问题严重，人们的思想很乱，所以他准备在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些问题，并出了个题目：《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胡乔木说这个题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宽一点，讲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务。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并让胡乔木帮助搜集材料，准备稿子。九月七日上午，邓小平通知邓力群去他那里，要谈二中全会讲话稿的事。邓力群就把帮胡乔木搜集材料、起草稿子的龚育之、郑惠、卢之超一起找去了。龚育之等把胡乔木设想的几个题目和稿子字数，向邓小平作了汇报。之后，他们反复作了修改。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上午，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特别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王若水说，很容易看出，胡乔木替邓小平起草了这个讲话稿；胡不过是借邓之口，讲出他自己的观点罢了。而这样一来，胡乔木的观点就具有了最高的权威性。

当天下午的会上，邓力群作了长篇发言，集中批判王若水近年的言论。他说，多年以来，王不是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而是作为现实政治问题来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归纳出王若水言论中有八个问题，加上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一共十个问题。会议还发了邓力群所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几年来〈人民日报〉理论版宣传中的问题》和《王若水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异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人

道主义”的基本观点》两份材料。邓力群对王若水在什么时候发表过什么文章，说过什么话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属下的书记处研究室早已把王若水的材料收集整理好了。邓力群的这个发言好像是放了大炮，震动了整个会场。

胡乔木在会上发言说：搞精神污染，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像“异化”问题，说得严重一些，就可以形成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纲领，一个反对派的纲领。从“四人帮”倒台后，就有人到处宣传“异化”；参加周扬同志文章写作的王若水，就是其中非常卖力的一个。胡话虽然不长，但给这个问题升了级。以前他主要是说人道主义和异化论对文艺界和青年的影响，现在和非法组织联系起来了。在中国大陆，“不同政见者”这个名词在当时刚刚使用。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字眼，如果还不是“反革命”的话，也差不多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革命，从未听说过“异化”这个词。会议组织者为了帮助他们了解，又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选择了“异化”这一条，印发给与会者。实际上这未必有多大帮助。不过，既然邓小平批评了，那么使用“异化”这个概念当然是错的，许多委员也就义愤填膺地声讨起来。

十月十二日是全会结束的一天。第二天发表了全会的公报，宣布会议结束。可是由于邓小平在十二日的讲话中提出了“清污”的问题，再加上胡乔木、邓力群在会上煽动，实际上会议延长了三天，并讨论“精神污染”的问题。而所谓的“精神污染”，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并不伦不类地搭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侵蚀）。会后，全部的宣传机器都发动了起来。

十月十九日，报纸报道李先念在全国工会十大上的致词，其中提到职工应当“抵制和克服各种精神污染”。

二十二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出现大字标题《保持工人阶级本色，抵制各种精神污染》。次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谈到了“精神污染”。

二十四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转发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通知》。这个《通知》措辞严厉，令人想起文革。胡乔木、邓力群在《通知》中把“不搞精神污染”提升为“清除精神污染”。

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是：《王震在两个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防止和清除思想战线精神污染》。这条消息第一次透露了“清污”是邓小平提出的。

十一月一二三日三天，广播了十个省的领导人的有关“清污”讲话。仅十一月二日的新闻节目，就发了六条省委领导人讲话。“精神污染”这个词用得如此

之多，以致《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字的铅字都不够用了……

胡乔木、邓力群把“清污”运动搞得来势汹汹，正好露出了狐狸尾巴。他们的目的不只是一要整几个知识分子或开明的文化官员，他们还要借口反对“精神污染”来反对随改革而来的西方思想的影响，进而反对开放改革特别是这个方针政策的统筹实施者；他们企图在中央高层酝酿“倒胡”——邓力群觊觎总书记的高位早已是司马昭之心。

文革是从“破四旧”开始的。这一场“清污”运动如果如此发展下去，后果亦不堪设想。幸好，胡耀邦、赵紫阳，以及万里和习仲勋等人头脑清醒，联手作了抵制。此时邓小平也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支持胡赵等人的抵制。

十一月十四日，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对“清污”正式讲了话。书记处作出两点决定：一、不要因为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而影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实行，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二、“清除精神污染”有它特定的概念，要研究分析各种具体情况，注意界限，注意政策，不能简单化。

一场喧嚣一时的“清污”闹剧闹了二十八天，终于半途而废。十二月二十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结说：“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势，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要提了。”万里插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胡耀邦说：“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再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

不过，此时历史的诡谲又表现出来。“清污”运动刹车之后，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又有了新的不满。问题在胡耀邦过后继续在不同场合，如同日本外宾谈话，同上海领导人谈话，都说反精神污染宣传走了样，搞了扩大化；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底召开中国作协四大，由于遵照胡耀邦的意见，开成了一个最“自由化”、最得人心的大会（中央祝词不提反精神污染，不提反自由化；人事安排组织部不插手，由会议自由选举；整个会议精神提倡宽松，呈现一派反左景象，让胡乔木、邓力群等人非常难堪），这些情况当然让陈云等老人发怒。邓小平终于同意端出胡耀邦（一九八六年北戴河期间，邓小平已下了决心，发话说：“如果说这几年我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把胡耀邦这个人看错了。”“六四”以后，邓改变了说法：“当时没有看错，后来却不行了。”）。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在另一场称之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胡耀邦被赶下台。不久，一个传说甚嚣尘上：

邓力群要当总书记了（例如，一九八七年六月下旬，王震找王首道，谈邓力群当总书记好。见李锐：《怀念同赵紫阳的交往》）。虽然，也是因为邓小平一句话，邓力群最后也垮了台。但这些权力斗争并没有改变王若水等人的命运。事实上，在一九八七年八月，王若水进而被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勒令退党，王拒绝后被予以除名。

五、解释权威：胡乔木讲演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胡乔木作了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演。

那天，胡乔木从医院出来，带着一个大口罩上台。主持人蒋南翔（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说，乔木同志感冒了，他今天是抱病前来的。接着，胡乔木做了简单的开场白，便由两个播音员轮流代念全文。正如胡在开场白所说，这篇讲话的起草是“历时三月，四易其稿”。从一九八三年十月开始，胡乔木就在准备这篇重头文章。按照中共的惯例，像他这样高位的人写这样的大文章，是要组织一个班子来进行的。参与起草的八个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办公室。胡乔木指定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贲思作为主要执笔者（邢贲思本来是反对人道主义的，包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过去一个著名的观点是：人道主义是一种欺骗，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更是双重的欺骗。当然现在他有所修正）。但起草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胡乔木一次又一次对起草小组谈他的提纲，一次又一次否定了草稿，以至后来不得不把主要执笔人换为龚育之，还多次召集专家讨论，征求意见，最后总算完成了。

胡乔木这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文三万九千字，分为四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三、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四、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

前两个问题那几年中国大陆思想界并没有多少争论，胡乔木用这样的方式来概括，不过是为了便于论证对方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已。的确，胡再讲周扬讲过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而且讲演地点和十个月前周扬一样仍选在中央党校礼堂，是发出一种暗示：周扬那次讲的不算，现在我胡乔木讲的才是货真

价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

胡乔木的文章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刊物《理论月刊》一九八四年一月号上发表。《红旗》杂志一月二十六日转载。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次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转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除了汉文以外，还有朝鲜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藏文、蒙文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共两千万册。加上报刊的转载，共三千万份。这个销售量仅次于邓小平的文集。但是，没有官方的外国文字译本。胡乔木似乎并不想让他观点在海外引起讨论。

正式发表的版本较之讲话稿作了一些修补。例如加了一处“改革”的字样。最明显的一处是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原先是否定的，现在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那么，使用这个术语原无可非议；只是这个术语很容易引起误解，不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那么恰当。

胡文发表前，在中宣部的会议上，邓力群作了高度评价，贺敬之也大加捧场。他们还说要写一批批判文章，要像当年写“九评”那样写“十评”，解决文化思想界的问题。

一月二十六日，中宣部根据邓小平的批示精神，发出关于学习和讨论胡文的通知。《通知》说此文对于几年来围绕着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展开的争论作了“科学的回答”，“对于推动理论工作者的健康发展，清除思想战线上的精神污染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工作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教材。”“各条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也要学。

一月二十八日，胡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党校开了一个庆祝座谈会。此后，各种赞扬在全国各地各级各部门包括各种报刊、电台排山倒海，响彻云霄。

胡乔木的讲演被看作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关于“精神污染”的讲话的最权威的解释；他听到了全国上下一片赞扬声。这毫不奇怪。胡文发表之前不仅经过中共中央的批准，而且还得到邓小平的赞赏（王若水说他后来惊讶地得知，邓小平实际上并没有看这篇长文章）。邓作了如下的批示：

这篇文章写得好。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或转载。由教育部规定大专学生必读。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按照邓力群《自述》所说，这一切，包括邓力群自己关于异化的观点的变化，都是来自邓小平的决定性的影响。书中说，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邓力群他们把讲话稿送给邓小平时，邓小平在谈话中讲了如下这些看法：

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十八条论述。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 1964 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呵？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说到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呵？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了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邓力群《自述》说，邓小平这篇话讲得非常好，非常重要。这一篇话使他和胡乔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都大大地提高了。有了这篇谈话，才能有他邓力群在二中全会西南组批评王若水错误的长篇发言。而胡乔木也是因为看了邓小平这次谈话，他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章才可能写得这样好。王若水讲，后来问题发展得这么严重，是胡乔木送了材料。实际上，胡乔木没有送材料，是周扬送了十八条语录，才使邓小平在异化问题上发表了这么高明的意见。

内中真相如何，大可值得研究，邓力群《自述》自然只是一面之词。但不管怎样，邓小平在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例如其中这段话，在全党全国是不容置疑的：

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 and 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 and 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

六、一场悲壮惨烈的抗争

——王若水单枪匹马反驳庞然大物胡乔木

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讲演的结尾，周告天下，他“恳切地欢迎”不赞成他的基本观点的人参加争论。对此宣告，全中国学者都心知肚明，这不过是说说罢了。即使胡本人真有此心，也没有谁胆敢挑战党的首席意识形态权威，而且此权威后面还站着一个最高领袖。

果然，完全意料之中，会后全国顿时万马齐喑，鸦雀无声，几年前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再出现。

只有王若水始终没有停止表达他的观点，一有机会就不时发出声音——整个抗争，可谓相当悲壮惨烈。

胡乔木讲演那天，王若水去听了。王最注意的就是胡讲演的这个结尾。胡乔木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周扬和王若水，而且首先是他王若水。周扬已经公开作了检讨，失去了反驳的资格，只有他能出来公开答辩，而且他确实想姑且试之，不想失去这个机会。当时，王的朋友、同事和熟人纷纷好意地来阻挡，只有三个人支持：刘宾雁、王若水的妻子冯媛和王的二妹。刘宾雁说得好：“这就好比在球场上，一个球落在你跟前了，旁边没有人，守球员是个庞然大物，你敢不敢踢？”

结果，胡乔木弄假成真了——自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第一次发生一个下级党员在报刊上公开反批评一个得到最高领袖称赞的政治局委员的文章。

这篇题为《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的反驳文章于一九八四年三月中旬写出，王若水单枪匹马一个人，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王若水在文章中说：人道主义并不是一种对世界或历史的解释，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包括伦理道德，但范围宽泛得多。我们需要对世界做出科学的解释，也需要对世界做出适当的价值判断，因此，我们需要唯物主义，也需要人道主义，两者都是世界观。胡乔木批评人道主义“不能对世界历史做出科学的解释”。王若水说，人道主义确实不能，因为这不是它的任务；它的任务是做出评价。王指出，当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的含义的一个方面是世界观和历史观时，他把价值观念排除在世界观之外了；而当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的另一个方面的含义是伦理道德时，他又把价值观念缩小了。难怪胡乔木认为历史上的人道主义没有多少可以继承的东西，因为人道主义最核心最宝贵的东西是落在他的视野之外的。王若水说，在社会观点上，马克思主义同以往的人道主义（即使它们是唯心主义的）有批判继承的关系。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并不是除了伦理道德之外就没有可以继承的东西；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都不是伦理道德可以完全包括的，而它们都是人道主义思想中很宝贵的东西，并为马克思所继承。

关于“人的价值”，王若水说，这是人道主义的核心或基本原则，人道主义的道德规范是从这个基本原则引申出来的。因此就绝不能像胡乔木那样，一方面肯定“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一方面又对“人的价值”的概念表示蔑视。在胡乔木文章中，集中力量来批评那些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人，因为他们还要讲人性、人情、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解放，而这些统统是为胡乔木所否定的。现在的主要问题，并不像胡乔木说的那样，人们对社会主义提出过高的、不切合实际的要求，而是许多合理的、可以解决的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被官僚主义置之度外。

王继续说，我们的社会存在着种种弊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即思想工作；但单是这个不够，还要进行体制的改革。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必定而且正在引起价值观念的变化；而适合现代化需要的价值观念，又必定而且正在促进改革的发展。提出人的价值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简单地归结为某些伦理道德规范，是把它的意义缩小了。历史上的人道主义的一个主要错误正是在于把社会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其实，道德问题正要从社会条件去找原因，问题在于改造社会。”

《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这篇文章，只不过是王若水回应胡乔木而为自己作的一些辩护，看得出他并没有太深入探讨，例如全文不涉及异化问题——他知道邓小平讲了话这就成了绝对不能讨论的禁区，而当下他考虑的是能否发表。

王若水这篇文章本意给《哲学研究》发表，但香港的《镜报》杂志突然在一九八四年六月号刊登了。王并没向《镜报》投稿，但他曾把稿子复印了几十份向人征求意见，很可能是其中的一份流传到了香港。胡乔木马上以此为理由，下令禁止王文发表；同时，严厉地责令人民日报社追查这个所谓“镜报事件”。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王若水成了可疑的阴谋分子。胡乔木、邓力群还不到此罢休。在他们的授意下，有关部门又加紧调查王若水和所谓“地下组织”的关系。

一九八五年初，政治气氛有些松动。《三月风》杂志向王若水约稿。王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关于“革命人道主义”》。胡乔木在他的长文里把毛的语录“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加以扩大的解释，王若水对此质疑。他问道，为什么一定要把“救死扶伤”这些行为说成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呢？这实际上还是把“人道主义”看成贬义词，如果不加上“革命的”一类定语，就不能对它肯定。王若水说，其实，革命的人道主义应当是以革命为主要手段来实现人道目标思想和行动。一个革命人道主义者当然要救死扶伤、帮助老弱病残等等，但不会满足和局限于这些行动。他的目标要大得多。他要消除不人道现象的社会根源，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就要推翻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反动政权。王若水的这种说法不仅批评了胡乔木，也否定了毛泽东对“革命人道主义”的理解。王若水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多年的历史证明，反人道主义的左的观点的影响和危害，比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大得多，因此应当是主要反左。

这篇文章不但刊登在《三月风》杂志上，还在《工人日报》发表了（值班编辑用了一点小办法），引起了相当的注意。第二天，总编辑一上班，就接到路透社记者的电话，问他发表王若水文章有什么背景。类似电话而后还纷至沓来。

一九八六年，王若水写了一篇更有深度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文汇报》于此年年七月七日至十八日连载。这篇文章是王若水在一九八五年作的几次演讲的整理，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论者认为，这篇文章以及以前发表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王若水对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遭到歪曲，就是因为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把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因而大肆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王若水自己也说，他认为

马克思的最好的东西在马克思的哲学里面，它仍有生命力，而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心得。

一九八六年，王若水还找到了一个机会，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近二十万字的文集《为人道主义辩护》。

这部书的出版也有一个故事。王若水想把那篇《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的答辩文章收进文集去。他在一九八五年八月开始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文章又改了一遍。这篇文章在一九八四年已经按照《哲学研究》的意见早就磨光了许多棱角，但仍有人觉得太尖锐了。有人更担心那篇《谈谈异化问题》，想把它撤下，因为这是邓小平批评过的。三联书店将出版王若水文集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出去了，中宣部出版处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编辑不敢答复。后来商量了一下，告诉对方说有这件事，但“稿子还没有齐”。对方要求看目录。三联书店总编辑范用想了一个办法：把那篇答辩文章暂时撤下来，也不列入目录。在全书的清样已齐，临近七月付印的最后时刻，范用从抽屉里拿出了这篇稿子，交印刷厂火速排出，加在清样中。结果，这本题为《为人道主义辩护》的新书出现在一九八六年的书市上，成了一本畅销书，人们排着队购买，初版三万册不久就销完了。

七、被党除名的王若水进一步就异化问题反驳胡乔木

胡乔木、邓力群对《为人道主义辩护》这本书保持缄默。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是聪明办法，因为反驳未必那么容易，而且会使这本书的读者大大增加。但是，他们找到了别的报复办法。如前文提到，在一九八七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继胡耀邦下台和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被开除出党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八月二十六日做出决定，要《人民日报》党组织劝告王若水退党；如果他拒绝，就予以除名。中纪委所列出的王若水的几条主要“罪过”是：

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

宣扬社会主义还有异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是执政的共产党异化为“与工人阶级对立的异化势力”；

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

以及在《人民日报》任职期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错误文章，包括发表周

扬文章。

王若水向党中央提出申诉，逐条批驳了中纪委的决定，但是没有得到回答。王若水觉得他已对这个党失望了——无情的现实把他青年时期的理想扯得粉碎。他有时夜晚从睡梦中醒来，痛苦地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无数先烈为之流血牺牲，我也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种心情曾反映在他于一九八五年写的《智慧痛苦》一文中。王若水于一九八九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的稿，但他们后来拖延不出）的另一本文集，书名就叫《智慧痛苦》。

一九八八年，不再是中共党员的王若水，在批驳中纪委决定的同时，开始进一步就异化问题发表反驳文章：《个人崇拜和思想异化》发表于一九八八年第十期的《书林》杂志；《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义没有异化吗？》发表于他和朋友合办的《新启蒙》丛刊上（分别在第二辑，一九八八年；及第四辑，一九八九年）。王若水终于答复了胡乔木对他的所有批判。

在《个人崇拜和思想异化》中，王若水反驳了胡乔木说的不能把个人崇拜“同宗教信仰相提并论”的说法。王说：毛泽东曾批评教条主义是把马列主义当作“宗教教条”看待，邓小平在八大的报告也把个人崇拜说成是“对于个人的神化”，人们没有听说过胡乔木对此表示过不同意见。那么为甚么不能把个人崇拜同宗教相提并论呢？为甚么不能说个人崇拜和宗教一样都是异化呢？胡乔木还把个人崇拜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的不谨慎和脱离群众，还有党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不成熟。王说这也是很费解的。毛泽东变得不谨慎和脱离群众了，那么他在群众中的威信理应降低，为甚么反而产生了个人崇拜呢？至于党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在一九五六年八大时一度是比较正确的，后来才陷于错误。这不是毛泽东受全党影响，而是全党受毛泽东影响。全党之所以接受了毛泽东的错误的阶级斗争观念，是因为对毛盲目崇拜。所以，个人崇拜是全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陷于错误的原因，而不是后者的结果。王若水指责胡乔木这恰恰是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

胡乔木指责王若水他们“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次根本性的“飞跃”。王若水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吗？》一文中评论说：其实，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固然是新的，但它必然带有它所脱胎出来的半封建社会（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的问题，必须靠对社会现实的分析来解决。一个基本事实是：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保留

和发展商品经济，因此就有商品拜物教，这就是一种异化。

胡乔木说，如果说异化是合乎规律的，又提出克服异化，这就是自相矛盾，因为规律是不可以克服的。对此，王若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问道：阶级社会的产生和阶级斗争是不是规律？如果是，共产主义者为甚么要为消灭阶级而斗争？理由很简单，阶级的产生和消灭都是合乎规律的，阶级社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又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消亡。我们现在不能完全消灭异化，因为产生异化的条件还存在，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采取措施去减少异化现象。如文革，就是可以避免的。

按照胡乔木的逻辑，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普通的缺点和不合理现象”，但这些不是异化；只有“足以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灾变’”才是异化，但是这种灾变并不存在。王若水驳斥说，且不说这种对异化的解释的错误，人们可以问：文革是不是足以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灾变”？胡乔木必须否认文革有这样大的危险性，否则就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

胡乔木给王若水他们关于异化的观点所下的政治结论是：它“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当固定的反现实倾向，又具有可以到处乱套的抽象形式，可以把社会上的一切消极现象都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党和政府的领导”。王若水说：这个话的实际含义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这种帽子是吓不倒人的。什么叫“反现实”？难道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难道像贫穷、愚昧、落后、犯罪、污染、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贪污浪费、腐化堕落这样的现实也反不得？难道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大锅饭、党政不分等等这样的现实也不能碰吗？不要改革吗？套用胡乔木的话说，“反现实”这个用语，正是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当固定的保守倾向，又具有可以到处乱套的抽象形式，可以压制对现实的一切批评和改革的尝试。但是，如果不改革，那就不管怎样空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样批判“社会主义异化论”，人民是不会信任共产党的领导的，这样社会主义事业真是没有前途的。

在《论人的本质与社会关系》一文中，王若水探讨了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命题的含义。在批评王若水等人的文章中，这句话是引证得最多的，胡乔木的论证也是以这句话为基础。王若水指出，马克思的下一句话是批评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这是什么意思呢？为甚么要批判人的本质呢？马克思的意思是，人的本质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这就是人的“现实的本质”。但社会关系也会异化，因而使得人

的本质也产生异化，使人不成其为人。人的真正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是马克思在《哲学手稿》中论证的），但人的现实的本质不一定符合这种真正的本质，所以马克思认为要批判这种本质，并进而推翻一切压迫人、侮辱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社会关系，这就是革命。把人的本质说成是受一定社会关系决定的，从而认为完全可以从后者出发来说明前者，这种观点，实质上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说的“人是环境的产物”没有根本的不同，都是否认了人的主体性。人性不是历史中的纯被动因素。如果既定的社会关系完全决定了人的本质，那么怎么谈得上改变社会关系呢？也许有人会回答说，这是因为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但是，人就是最主要的生产力，束缚了生产力就是束缚了人。如果他们的本质已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他们又怎会感到这种束缚呢？

王若水认为，总的来说，他对这三篇文章要比对他最初写的那篇长文要满意一些，特别是《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一文比较多地从正面表达了他的观点。

有意思的是，尽管在胡乔木的文章发表后，出现了几百篇响应的文章，可是王若水的反批评文章出来后，却没有什么人出来批驳或商榷。据说，胡乔木曾授意邢贲思写文章驳王，邢婉言拒绝了。胡乔木又不愿意自己出面发表文章，于是又一次施用他最聪明的办法——保持缄默。显然，他已意识到，他的反驳只会更加引起人们对王若水的文章的注意。但发表王若水文章的《书林》和《新启蒙》也付出了代价——两种刊物都被戴上“自由化”的罪名而先后被迫停刊了。

八、最后岁月：思想越来越独立的王若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旬，王若水把“清污”运动的前后内幕，把他这场惨烈悲壮的抗争的过程，写成一部二十五万字的纪实文学。这部著作一九九五年五月脱稿，一九九六年一月修改，一九九七年九月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此书第一次修改稿曾有一个英文节译本，书名为：THE ANTI-SPIRITUAL POLLUTION DRIVE—A FORMER PEOPLE’S DAILY EDITOR REMEMBERS——《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人民日报前编辑的回忆》，作为 CHINESE STUDIES IN PHILOSOPHY——《中国哲学研究》一九九六年夏季号专辑出版）。王若水原来给这本书取的名字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个当事人对“清污”前后的回忆》，明镜出版社出版时经王同意改成《胡耀邦下台的背景》，虽然在内容方面相应作了一些补充，但准确地说，

这不是关于胡耀邦下台的全面的历史而还是王若水个人的回忆录。在书中，王若水以铁的历史事实，铁的逻辑（当然是王所认可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说明了真相，而真相自然把某些人钉在耻辱柱上。

一九九七年五月七日，王若水在后记中还作了如下声明：

这本书中的有些观点是我当时的观点，并不和我现在的观点完全一样；如当时我还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一致的，现在我已不这样想了。

的确，如人们注意到，也为许多论者指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王若水的思想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切合实际。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上世纪末几年，王若水卷入一场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缘起一九九五年底，王若水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于纽约的《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一月号。“马克思主义批判”是该期封面主题，同期刊载有郑义的《最后的图腾——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清算》。其后，此刊同年九月号登载了高寒的《马克思主义辩——兼与王若水、郑义先生商榷》，很快，郑义在同年十月号发表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再清算——答高寒》，王若水也在此刊二零零零年二月号发表了《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答高寒先生》。王若水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目的是“想初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共产主义的实践”。人们习惯都说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以此刚好相反，他认为那两场革命都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觉得，共产主义理想实际是乌托邦，达不到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本上过时了；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它的哲学，但是这个哲学跟列宁所讲的不一样，不是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王若水觉得最好把马克思的哲学叫作“实践的唯一主义”。他说：

实践的唯一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和方法论。这种思想也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力异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价值。

他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进步，但马克思主义中的精华，即实践的唯一主义仍会被许多人继承和发展。

王若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结尾处写道：“（中国）官方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加以批判；海外又有人因为我仍然讲马克思主义而觉得奇怪；这些我都不在乎。”这样，他通过独立思考，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批判的分析，指出有一些确实是错了，但同时也指出世人对马克思主义有六个误解。论者认为，该文是一篇极有见地的文章，无论是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有些论者还认为，王若水似乎越来越转向自由主义。

王若水《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答高寒先生》一文也表达了一些闪亮的观点。例如，王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全人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的理论根据，但这样一来，马克思在否定了“救世主”之后，又确立了一个“救世阶级”。列宁继承了这个思想，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实际上是“救世党”），这个先锋队又由几个最有威信，最有能力的领袖来领导——这就是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观点。中苏论战中，中共就是用这一套理论来为个人崇拜辩护的。从救世阶级到救世党，从救世党到新的救世主，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拙文开头提到《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这是王若水于二零零零年年底前完稿的，几乎可谓是他的“绝笔”了。在此文中，王若水推翻了他的老领导周扬说过的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之一的定论，鞭辟入里地论证了那是毛泽东为排除异己，在党内确立个人绝对权威的一场运动，而且是全国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祖本和样板。它开创了依靠群众运动来进行思想斗争和“肃反”的先例，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一直到文革，所有这些运动都和延安整风一脉相承。文章的结尾说：

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新的觉悟、新的启蒙运动。这是因五四运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我们今天又需要启“党文化”之蒙……

如论者所言，王若水这篇文章因其高屋建瓴的深刻分析，使之成为反思延安整风运动的经典之作。

在生命最后的几年，王若水除了全身心地研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外，便是要透彻研究毛泽东。他即使在一九九六年被发现患有肺癌并作了切除手术之后，还是力战恶疾，加紧研究和写作。直到他生命将尽之际——在二零零二年元旦上午，医生边给他治疗，他还边口授文稿，由他的夫人冯媛在电脑

上记录了二千六百字。那文稿思路清晰，语言干净，不需要什么编辑。终于，在王若水去世后的同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冯媛在《编后记》中说：“王若水以一己之力，垂老之年，病弱之躯，尽量克服这些困难，先后完成和发表了若干论文，并使本书大致成型。”这部分上、下两册、厚达七百五十六页的巨著，是极少见的研究毛泽东的严肃的科学著作，可惜王若水本人已经不可能看到他的心血凝聚的结晶了。

文革以后，中国人民痛定思痛，把毛泽东撵下神坛，要求评毛。早在一九七九年理论务虚会上，王若水作了《文革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的发言，开公开评毛之先河，得到了普遍的响应。但是很可惜，评毛的进程被阻挡了。后来这些年，大陆有不少关于毛泽东的书，其中大部份是毛身边的人所写的回忆录。对这么多的“仆人”的回忆录，王若水套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仆人眼中无英雄”的谚语，说“仆人眼中也无奸雄”。他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毛泽东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整得家破人亡，把无数知识分子加以摧残，把他的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友打倒，对这一切，他什么时候表示过丝毫的忏悔？那么，他在仆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那一点人情味，又算什么呢？

因此，王若水以他非凡的学养和历练，第一次全面深入地论述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并特别选择毛的个人性格和心理因素这个侧面作深层次的剖析。论者认为，他呈献给读者的研究成果，他“新发现的毛泽东”才是“真正”的毛泽东。

九、公道自在人心

——新时期思想学术界留给历史的“第一脚印”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毛的阴影还在，虽然还有人为毛招魂，但毛的时代毕竟过去了。在过去，像王若水这样受党中央批判的人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几乎一辈子都遭人白眼。而现在，王若水发现，一旦政治气候变得比较宽松的时候，他在许多地方还是受到欢迎。大学生请他去讲演，学术团体邀他去开会，辽宁大学甚至授予他一个荣誉教授的头衔。最让王若水铭记在心的，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常常提到的，当然是那些不畏风险写出的对他直接或间接支持的文章。

例如，一九八五年初，四川省的一份新办的刊物《大时代》在创刊号刊出了

冯川的《马克思理解的人性》。文章的结论说，马克思关于人性的思想，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思想。这恰恰是一种历史观而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观。毋宁说，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与旧人道主义的根本分界线就在这里。这家杂志在第二期又登了高尔泰的一篇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长文《人道主义——当代争论的备忘录》。高尔泰说，马克思主义对抽象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正是集中在这些学说仅仅把人道主义当作一种道德要求，并企图通过伦理说教来实现它；把人道主义当作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来论述，不但不是什么创见，而是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抽象人道主义的水平上去了。高尔泰还指出，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应该是一致的。只差没有点名，高尔泰针锋相对且非常雄辩地逐一批驳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在理论上击中了胡的要害。

一九八五年四月，西安出版的《文学家》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原在人民大学学习的李贵仁的硕士学位论文《人道主义——文学的灵魂》。这篇写于一九八二年的论文，作者公开声明是献给周扬、王若水、王元化等人。文中批评了邢贲思等人的观点。作者在《附记》中说：“在我写出本文一年多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新的反人道主义思潮。……我始终坚信，历史会对任何问题作出无情而公正的判决。”（由于李贵仁的文章，这一期杂志后来被省委宣传部下令收回。）

一九八五年七月，刘再复发表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文汇报》，一九八五年七月八日）；后来，他还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的长篇论文（《文学评论》一九八五年年第六期、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刘再复提出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呼吁作家赋予人物以主体性。他认为，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是历史运动的轴心，看作历史的主人，而不是把人看作物，看作政治或经济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也不是把人看作阶级链条中的任人揉捏的一环。也就是说，要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刘再复提倡人道主义，歌颂爱的力量。他说，每一个有作为的诗人和作家，都应该有自己追求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爱，就是与全人间的悲欢苦乐相通的大爱。这种爱是超我的，超血缘的，超宗族的，超国界的。刘的论文产生了轰动效应，在文艺界影响很大。尽管王若水并非同意刘再复的全部观点，而且觉得刘没有使用异化的概念因而使得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和现实脱节，但他高度评价刘的这两篇论文，看作“实际上是四十多年来向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系统的挑战”。（这一点刘再复本人在当时不愿意承认。还有

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刘的主体性论文同时受到胡乔木的高度赞赏。)

以上文章没有谈异化问题，看得出大多是不得不刻意避开，如高尔泰在《备忘录》附记中所声明那样。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改变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广州日报》用一整版登载了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有一篇是黎克明（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研究异化理论》，其中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黎克明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主体客体统一的哲学”。有人不承认异化概念是一个科学的概念，理由是：凡讲人的本质的异化，必然包含了抽象的人性理论，并以这种理论来描写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针对这种观点，黎克明提出：要了解人的本质，单是向后看是不够的，还要向前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理论，需要一种理想模式作为逻辑前提，作为座标。在未来的社会里，人的本质——创造性的自由活动——将充分实现。

一九八八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孙月才发表《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与百家争鸣——重读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海理论（内刊）》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孙月才提出三个问题：一、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能不能批判继承？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着异化现象？三、是百家争鸣，还是定于一尊？孙月才认为，应该从世界观历史观的高度来肯定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异化现象，这本来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孙月才提出公开讨论胡乔木文章的要求，并点了胡乔木的名字，这是很有勇气的。他的文章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可惜这篇文章只能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发表。至于他第三点批评“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在王若水看来，就人道主义和异化这个具体问题来说，问题倒不在“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甚至也不在“太政治化”。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政治意义的。周扬和王若水都不讳言这一点。提出人道主义，是对文革进行痛苦的反思的结果，是对“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反弹。指出当今社会上存在异化现象，是为了克服它（这里不涉及能否彻底克服的问题）：克服政治的异化，要靠民主；克服经济的异化，要靠改革；克服思想的异化，要靠思想解放。这些意思，都是在他们的文章中说得很明白的。

王若水一直记得孙月才这篇他认为的“好文章”。他去世前半年交给他朋友两个“附录”，其中之一题为《有关孙月才文章的反映》。“附录”上有一行铅笔字，是王若水的笔迹：“这是准备将来三版时增加的两个附录”（将来三版的书指

他的《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召开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理论讨论会。王若水拒绝参加（因为把他当作另类代表）。苏绍智参加了，他利用这个机会为因“清污”和“反自由化”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学者辩护，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发言。他说：“王若水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根本没有错误，现在全世界进步人士都把人道主义看做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而异化，在中国、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无处不在。”

一九八九年二月，高尔泰还了一个心愿——发表了长篇学术论文《论异化概念》（《新启蒙》第三辑，一九八九年），探讨他在一九八五年写《人道主义——当代争论的备忘录》时未能探讨的异化问题。王若水赞赏说，高尔泰这篇论文是他看到的国内对这个问题的最深入最详尽的阐释，显示了作者的功力。

王若水的一些较有地位的老相识后来也公开发表支持文章了。秦川在香港《镜报》月刊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号上，于光远在一九九七年的《广州文艺》上，都分别叙述了这件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件并表明了他们支持周扬、王若水的态度。

因“六四”下台的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赵紫阳也看到并赞成王若水的文章。李锐曾回忆说，一九九五年王若水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时，给他寄了一份。他立即复印托人带给赵紫阳。赵很喜欢读书，有善于思考的习惯。他读后很赞成王若水的观点。（李锐，《怀念同赵紫阳的交往》）

历史似乎可以划下——或者不如说，已经划下——一个句号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常念斯的一篇回忆文章：《老泪纵横话乔木》，发表在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读书》杂志上。作者在盛赞胡乔木之余（胡已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去世），特地表示：

近十五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错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

“常念斯”是一个化名，此人显然是胡乔木的老友，而且有些来头，他当然不会说出胡乔木“虽然没有掌握真理，可是掌握了权力”这样的话，不会说出胡把理论论争变成政治迫害，无时无刻不在搜索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份子，随时准备抽出他那自诩“锋利”的“宝剑”，但他如上文中讲出两个“恐怕”——从胡乔木赞赏者口中讲出，其意义“恐怕”不小。

夏中义以新时期思想学术界留给历史的“第一脚印”来形容当时周扬、王若水、王元化三人联手发起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见《学术思想二十年——夏中义、王家范、童世骏访谈》，《社会科学报》原发，《学术批评网》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转发）。夏中义指出，就本土语境而言，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学术讨论，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道主义问题一提出，会引起震动，为什么讨论远还没展开就被窒息在摇篮中，甚至其作者还承受那么大的代价。当一个社会连人都不便谈，那么人的现实境遇将会变得怎样？只能是……人被“异化”。所以一九七八年以后提“异化问题”，其本意就是讨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现象。人被异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失去了青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里说的两点：一是自由，二是自觉。就是说人不再是一个价值上充分觉醒行为上能驾驭自己的独立主体，用当时的主流词语讲，他是“螺丝钉”。

十、王若水的预见与严重异化的今天中国

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大陆大批大批的学者或非学者，甚至政府官员，包括当初批判人道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有异化的人，都在把“人”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研究，都在谈异化，都在谈人的发展、人的价值……等等。事实上，“异化”这个高度专业性的哲学术语，今天已经进入寻常社会生活之中。打开任何报章杂志或电视台，都可以看到或听到这些说法：权力异化与腐败现象；女性意识的异化；艺术的异化；中国足球已经异化了；知识时代作弊是知识的普遍的异化；招生指标异化为敛财的工具；爱情被金钱异化了；“富人”政治权利的异化；公权异化；公务员身份被异化；手机的异化；贵族化月饼异化成礼品、政治生态环境的异化、发展的异化、道德异化、权力寻租行为的公然异化……诸如此类，五花八门，多不胜数。

其中很有一些严肃的讨论。例如，从政观的“异化”被总结出五个方面：一是“极端个人化”，某些人从政是私欲膨胀，一味地为自己谋权夺位，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私有化、垄断化，作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二是“市场交易化”，某些人视从政为投资，以职权为资本，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极力为个人谋求非法利益；三是“特殊化”，某些人俨然以“官老爷”自居，高高在上，处处炫耀，盲目追求各种特权，猎取各种便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

百姓点灯”；四是“庸俗化”，有些人一心只想当“太平官”、做“和事佬”，曲意迎合，一团和气，四平八稳，以牺牲原则来调和关系，随波逐流，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五是“虚荣化”，“不求有为，但求有位”，以外在的职位粉饰自己的形象，摆架子、讲排场、耍威风，沐猴而冠，招摇过市，飞扬跋扈，得意洋洋，咄咄逼人，实则内心空虚而贪恋禄位。

一般共识是，公共权力过滥和异化，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而且其毒素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肌体的基层细胞和神经末梢了。众多中箭落马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之所以能财源广进，就在其拥有无上的权力。这一柄任命的尚方宝剑，足可以在当地横扫一切。而更为隐蔽的公共权力异化现象，是众多的权力部门以立法的形式规范、稳固本部门的特权，又没有有效的制约形式和机制。以国家机器作后盾的权力异化和泛滥，后果是令人震悚的。

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是今天中国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论者指出，由于公共权力异化的行政垄断，而由行政垄断造成的行业垄断使公有制的全民产权异化成垄断既得利益集团的私有产权，基层公民大众的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及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被垄断既得利益集团剥夺了，这就是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事实表明，在众多公权泛滥和异化的现象中，公共权力与垄断经济的狼狈为奸，后患无穷，弊端极大。但是，在中国这个政经合一的国家，这个现象太普遍了，也正因为普遍，人们已熟视无睹。

论者指出，像“权力私有化”、“权力商品化”、“权力特殊化”、“权力家长化”，这些并不是单个出现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公共权力的泛滥，是公共权力失控的前提，也是公共权力异化的基础。大量的公共权力异化得不到有效扼制，将使整个社会呈现畸形发展。因此，有人提出，要根治腐败，就必须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共权力的异化，尤其是要解决“一把手”的权力异化。

中国当前出现道德信仰危机，有一个名词形容：“道德滑坡”，或更为甚之：“零度道德”。以下现象是人所公认的：社会许多领域许多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经常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令人极之忧心的是，这些现象竟然随着共产党“突出经济”的宗旨的确立、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严重。论者指出，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影响社会

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首先，道德信仰危机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道德所调节的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实质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应该提出解决“道德异化”问题，用以重建中国现代人的生命观、道德观、底线观、审美观、人格观，等等。

今天的中国，人们大谈特谈“发展的异化”问题，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吃了苦果痛感前非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邓小平的决策让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但是，单方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就成了中国式的“指标崇拜”，发展就开始了异化。今日中国，伴随高增长，是更多的“不可承受之高”：高通胀、高失业、高负债、高腐败、高消耗、高污染。各地政府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短、平、快”工程，于是，相应出现腐败工程、“豆腐渣工程”、重叠工程。根据权威资料，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中国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球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八个；中国城市河段百分之七十受到污染；三分之二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

现在，对照今天中国社会严重的异化现象，人们实在不能不惊叹：当年王若水、周扬他们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真是具有天才的预见性！他们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提出的“异化”概念扩展为：各种异化现象，都是束缚人、奴役人、贬低人的价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剥削是异化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下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的解放，即全面的解放。从这种理解出发，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异化”现象，存在着“经济领域的异化”、“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权力的异化”，以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早在一九八零年（几乎三十年前！），王若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他们在改革开放方始之时，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并提出来，目的就是从理论上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为改革开放提供价值论指导——把人道主义的价值目标补充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去，把价值、功能和结构三重规定一体化，从而希望使传统的社会主义事业起死回生，值得向往。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真知灼见！这是多么巨大的功绩！又是多么大义凛然！

老子云：“上善若水。”王若水就是这样上善之人，在各个方面都足以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世界上最柔弱的东西莫过于水，然而，滴水穿石。正是若水精神，鼓舞着许多志士仁人，各尽绵薄。❏

【专稿】

1967.9 ~ 1968.7 : 染血的回忆 (上)

——人大两派群众组织割据武斗的 11 个月

李豫生

1968年5月22日一场空前惨烈的武斗在人大校区西部游泳池东侧空地发生,“人大三红”及“新人大公社”双方前后各有七八十至百五十人参加(见1968年5月29日《人大三红报》第62期第四版文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五·二二反革命武斗事件记实》)。其间骨干武斗队员手持锋利长矛近身相互捅刺,致使双方各有三四十人严重受伤。而因新人大一方的参与者中有部分同学是被突然招呼上阵的文艺宣传队员,这些同学没有防护且未经训练,仅拿着简易的棍棒……(见人大某微信群2017年7月11日文革武斗相关讨论),因此当场有3名同学:廖金妹、杨大志、陈荣祖被刺身亡,还有一名被刺中头颅的沈士根同学在瘫痪失智年余后死亡。

事件中最令人痛惜的是农经系一年级女同学廖金妹的死。她就属于被仓促招呼上阵的文艺宣传队员,既无武器也无铠甲,虽身在现场但绝不可能参与对刺。她是在救护同学后撤的状况下被刺,致命的一枪从她的右后背斜刺而入,直穿心脏,即刻毙命。刺人者心地之残忍、下手之狠毒绝无疑义。

两个月后制止武斗的军宣队进校时也曾重点追查此事,但因时值“打倒杨、余、傅”之际,而死的人又都在新人大一方,所以追查的重点是背后有没有杨、余、傅的黑手(见2017.11.21对李德山的采访),遂致无果而终。

但人们相信,刺人者当时并非混乱或失手:因为他曾下大力从背后追着猛刺了一个对方救护伤员的女同学一枪,完全不是在蒙面对刺的情况下,况且他还需将长矛的矛尖拨回,这也是要费大气力的!也许只有杀人者自己清楚,但为求自保他选择永远不说!

曾经同校共读的学友就这样死在了同学的长矛之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当时大学校园里的两派所谓“革命群众组织”走上了兵戎相向、你死我活的武斗战场

呢？应该有所追究、有所反思。

—

著名文革研究学者印红标教授在《文革时期“武斗现象”研究》一文中把武斗分成三种类型——“红色恐怖型”、“派性斗争型”和“刑讯逼供型”。

人民大学的“派性斗争型”武斗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抓人比赛到割据形成自1967年9月1日“三红”抓萧前始，至11月底两派在北京卫戍区派出的军宣队主持下签订制止武斗协议止。

第二阶段从备战加剧到激战终结自1968年3月27日打倒“杨、余、傅”起，至8月22日第三批军宣队进校，群众组织自行消亡止。

人大武斗的两个阶段是直接由文革起始的前五个回合中的第四、第五回合引发。即“第一阶段从抓人比赛到割据形成”是由“第四个会合”——“击退了刘、邓、陶的小爪牙关锋、王力、戚本禹”而引发；“第二阶段从备战加剧到激战终结”是由“第五个会合”——“揭露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反革命面貌，把它们打倒了”而引发。

“文革的前五个回合”是1968年3月27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对此前逐浪高涨、风云诡橘的文革狂潮所做的总结归纳。这一天，在中央文革于东郊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革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这位中央高层顶级秀才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结结巴巴、语音难辨地说：

这个大革命已经进行快两年了，经过了几个大的战役，经过了几个大的回合，这里不说还有一些小的回合。现在大概可以说我们第一个大回合，就是打倒彭、罗、陆、杨，在这个回合的战斗中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了。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在这一个回合战斗中，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了！第三个回合，就是击溃了去年二月所兴起的二月逆流，这是以谭震林为代表的一些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家发动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这个二月逆流击溃了，（口号）二月逆流是彻底的破产了，（口号）彻底失败了！有一些极少数人企图为二月逆流翻案，这是妄想！这是第三个回合。第四个回合是击退了刘、邓、陶的小爪牙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家伙是变色的小爬虫，他们使用各种方法钻到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做

了很多坏事，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他们打倒了！把它挖出来了，把它们挂起来了。无产阶级文革的第五个战斗的回合，就是揭露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反革命面貌，把它们打倒了，这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把他们打倒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后台，他们是刘、邓、陶遗留下的余党，同时又是刘、邓、陶小爪牙，关、王、戚的后台。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揭露了他们，打倒了他们，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第一阶段从抓人比赛到割据形成自 67 年 9 月 1 日“三红”抓萧前始，至 11 月底两派在北京卫戍区派出的军宣队主持下签订制止武斗协议止。

人大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人大三红”和“新人大公社”，以贯穿校园东西的“共青团路”为界、划区割据，摆开武斗阵局，始自 1967 年 9 月 1 日发生的“抓萧前事件”。

二

“三红”为何抓萧前？因为当时公开亮相于新人大并成为新人大公社副社长的原哲学系主任萧前与关锋有很深的私交，文革前萧前在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发迹本身就得得益于关锋的提点，他在人大文革中的一系列行动又都征询过关锋的意见。如此紧密的关系，在关锋贵为中央文革要员之时，萧前当然是其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定心丸。旋而关锋一倒，“香饽饽变成了烫山芋”，萧前便陡然成为“王、关、戚的小爪牙”。天上掉馅饼，“三红”一下子抓到了攻击对立派的致命武器。萧前成了“三红”炸垮新入大的重磅炸弹。

李德山是“三红”派去抓萧前的负责人，他回忆说：

萧前在文革前和关锋是好朋友，都是哲学界的，而且萧前是紧跟关锋的，萧前第一位夫人去世的时候，还是关锋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夫人）。萧前之前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本里走出来》，那篇文章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那个内幕都是关锋透露给萧前的。那句话原本是毛主席讲过的，所以这篇文章正好迎合了主席的这个想法，萧前一下子火了。这是 63 年以前的事情了。

因此萧前跟关锋的关系很好，所以关锋他们要被江青他们抛出来的时候，

就开始散布（透露）消息，萧前是跑不了的。

萧前是被戚本禹解放出来的，戚本禹到人大讲话，一个是解放他，另外一个就是解放胡华。所以新人大就把萧前弄过去，当了副社长。人大三红（这次）就抓住了这个机会，要整垮对方组织，他们就想抓住萧前，萧前还不知道呢！那天总部来找我，让我接受一个重要任务，去萧前家里抓他。

这事儿当时还没公开。是孔宪龙突然通知我那天晚上要去抓他。我知道后就把萧前给弄来，弄到总部去了。但是新人大一知道把他们的副社长给抓走了，就开始围楼了，围攻我们办公楼。新人大在武斗的时候是很厉害的，所以要想办法把萧前给运走。

当时就从总部后面悄悄运到了法律系的东风三楼里呆了一段时间。到了晚上，新人大的人越来越多，呆在这里也很危险。当时“三红”一面就想办法和北京体育大学联系上了，应该是北体有一派和“三红”也有联系。就从学校外面找了一辆卡车，开到了墙外面等着，我们怕新人大的人看见，就把萧前用床单还是什么的给裹了起来。手脚是我捆的，怕他给跑了。然后几个人很快抬着运了出来，我跟着出来上了墙头，外面还有一个人接应，就把他放在卡车上了。运到了北京体育学院，放在游泳池的更衣室里。

萧前能够成为新人大副社长，有其必然性。

经历过文革的“革命群众”都知道：文革并非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而是以伟大领袖一人为头脑、亿万人民群众为直接手足，一举摧毁各级原有社会管理机构的天翻地覆，这就是伟大领袖一手导演的“天下大乱”。

其间，只有直接受命于伟大领袖的极少数几个人组成的工作班子——“中央文革”，才有可能了解最高领袖的旨意并负责向亿万群众传布。亿万群众以及失去了权力的各级干部必须竭尽最大努力探寻、了解最高领袖的心思，并将是否与其心思相符作为“革命”与“反动”的界限。各部分群众因对“上意”的揣摩不同，必然分成对立的派别。对立的派别又都想通过各自的人脉、人际渠道抢占先机，争取先对方一步站到与最高领袖最贴近的位置。

由是，新人大有了萧前——王、关、戚的“铁哥们儿”这个副社长；“人大三红”有了聂真——伟大领袖敲响大革命开场锣的重锤、标杆聂元梓的亲大哥这个“铁后台”。

三

在现有资料中我们看到了萧前亮相新人大后的一篇文章，足以表明他是如何直接受教于关锋的。1967年3月，萧前刚刚亮相新人大不久，就在《新人大》报第三期发表了署名文章——“剥开‘三反’分子孙泱的画皮”，文章中，萧前有三处地方提到关锋。一是说在前中宣部召开的学习和讨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会议上，关锋如何当面批判许立群并加以质问。显然，这些话非关锋亲口告知，萧前不可能知道。二是在批判三家村时，语文系一些人编了有关《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材料，被孙泱加上了旧市委的按语定调，后又隐匿‘罪证’。萧前到前党委讨要这份资料，准备直接送交关锋，但遭到拒绝。三是，批邓拓时，《红旗》杂志林杰、闫长贵找萧前转达关锋意见，要组织揭发邓拓与林希翎关系的文章，萧前去找孙泱要资料，孙泱推托。后在萧前的逼迫下，孙又称已将法律系写的资料送上去了。事后萧前向关锋核对，关锋告诉他材料并没送给过关，而是送到其他黑帮分子手里了。

这篇文章的用意实在是明显的不能再明显，萧前俨然是“钦差”的“钦差”，彼时的新人大真可谓“背靠大树好乘凉”！

但是，按照当时“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萧前一旦站到新人大一边，“三红”就必然激烈反对。对此，新人大战士坚定表示：“萧前同志我们是‘保’定了。”在1967年7月26日第二十八期《新人大》报第四版上发表了署名“慨而慷战斗队”的文章“彻底解放萧前同志”，文中写道：“萧前同志最早从黑党委冲杀出来，大造狗特务、三反分子、我校头号敌人孙泱的反；萧前同志十几年来在理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基本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胡适、杨献珍、孙定国之流进行了斗争；萧前同志一解放，立即喊出了‘打倒三反分子崔耀先’的口号，尽管萧前同志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写过不好的文章，但是，正如毛主席教导的：‘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正因为如此，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多次解放他，说：‘萧前同志不是黑帮，不是右派’，‘萧前应该归到多数里面’，‘你们应该解放他了’，等等。”

这都表明了萧前在新人大不可替代的地位、作用。

在新人大对人大三红的激烈抨击中我们看到，站在“三红”背后的是原人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聂真有一个当时在中国红透半边天的妹妹聂元梓，对，

就是那位著名的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聂真是聂元梓的亲大哥，种种缘由，使他成为了人大三红想紧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押宝”。

据《新人大》报揭发：

为了保聂，孔宪龙四月底、五月初（1967年）还亲临聂府，向聂真妹妹聂元梓请示密谈。聂元梓说：“据我了解，聂真还不像三反分子，但是这个人没有什么原则。”孔宪龙、刘庆库们听后如获至宝，在一次核心会上，孔宪龙把这件事当做大好消息告诉了他的同伙，并且说：“聂元梓由于他的身份和地位，看来有些话不好多讲，但是就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来，聂元梓是认为聂真打不倒的。”刘庆库信心十足地说：“聂元梓能够说这两句话，已经很不简单了，她的观点很明确，聂真可以保！”孔宪龙最后兴高采烈地说：“原来我对聂真问题还不敢下决心，现在聂元梓都这样说了，我们可以下决心保了！”（见《新人大》报1968年1月20日第57期第2版文章“死保聂真铁证如山三红总部回头是岸”）

人大三红在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派别斗争中一直站在以新北大为主的“天派”一边，孔宪龙与聂元梓交集密切，以聂元梓对聂真的看法为准绳，不能不说是站在站队中最有把握的选择。

《新人大》报又披露：

继人大三红总部窝藏了三反分子崔耀先、狗特务铁华之后，八月六日他们又把现行反革命分子聂真藏了起来，这是他们死保狗聂真的铁证，是他们保皇的最高峰。人大三红总部干部组负责人之一王XX供认：“把他（指聂真）弄在这里是三个头头（即孔宪龙、刘庆库、安维华）决定的。那天聂真说是去看病，实际上是假的，是到我们这里来了。……原来想把聂真放到北大去，但是，现在北大斗争很激烈……放到那里不保险，因此，还是放在三红这里，我们这里还是比较安全的。”王XX还说：“三个头头决心保他，认为有把握……三个头头态度坚决，说把聂真放在这里，他们负责。……三个头头找聂真谈了话，专案组也找过聂真。……聂真自己也不愿意走，希望三红一直把他保起来。”

“狗朱真也不得不承认：‘三个头头是打算把聂真长期放在三红这里，坚决保他，而聂真当然愿意这样做……三个头头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把聂真藏

起来，是打算在适当的时候把聂真问题公开提出来，在人大解决，准备同他三结合。’实际上，聂真在三红总部窝藏期间，到了千里之外的青岛，亲自策划了地下黑党委的反革命青岛黑会。”（同上见《新人大》报1968年1月20日第57期第2版文章“死保聂真铁证如山三红总部回头是岸”）

朱真是聂真的秘书，是“人大三红”主要结合的中层干部，被结合后即成为“人大三红”的核心成员，积极参与“人大三红”的各项工作：在1967年7月22日的“人大三红”报上明确报道了朱真在“三红”干部革命大批判大会上发言的情况。这篇题为“在大批判中建新功立新劳”的报道写道：“在毛主席干部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校大批革命干部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抑，纷纷杀了出来。他们坚决响应中央文革和市革委的号召，拿起笔，作刀枪，以各种形式积极投入了当前的大批判运动。七月十五日，他们召开了广播誓师大会，吹响了大批判的进军号。孙锁存、朱真、宋德敏、樊亢等革命领导干部在会上发了言。七月十七日晚，他们又自己主持召开了《彻底埋葬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这是一个充分显示了毛主席干部路线无穷威力的大会。”

聂真在人大工作期间，朱真一直担任他的秘书，文革后朱真没有再回人大，而是跟着聂真去了社会主义教育学院，足以说明他们渊源之深。

既然找“红人”、跟“红线”是文革的常态，为什么革命群众组织又会不断出现跟错人，站错队的现象呢？

这是因为最高领袖的目标、意图不断发生变化；最高领袖对所使用的极少数人的好恶及信赖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正所谓“昨日堂上客，今朝阶下囚”。

在所谓的五个回合的斗争中，前三个回合还是革命先锋的王、关、戚、前四个回合还是领袖近侍的杨、余、傅，尔后相继翻身落马、逆转成为打倒对象。权力中心在大革命中走马灯式地连番洗牌，使得始终想紧跟伟大领袖战略部署的各派革命群众组织手忙脚乱、无所适从，大家都要防止在急速的弯道转车时被革命的列车抛下，更何况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弯道转车。

斯大林的名言：“每当历史的车子在转弯时，总会有人从车子上掉下来。”一时流行，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在瞠目结舌之时，必须与曾经的“偶像”急速切割、断臂求生。

四

萧前被抓，新人大怎么办？

新人大中立即有人“弃暗投明”、“再次造反”。九月十二日“新人大斗肖联络站”成立，他们中的知情人这样“揭发”——赵桂林当即纠结：“（在萧前问题上）承认错误，那我们的一切不就都错了吗？”（见由反出新人大“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革命造反联络站”1967年12月16日另行出版的《新人大报》红一字第2版文章——“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足见当时新人大一派的震惊、惶恐。

曾经的中央领导王、关、戚当然不是孤立的个人，位居高位时他们上承伟大领袖，下联两报一刊、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一派造反组织，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也因萧前关系作为嫡系位列其中。当时在人大设立的“批资联委会”，就是他们经常在一起碰头议事的临时机构。原准备时刻听从领袖召唤，冲在最前方。孰知世事难料，领头失势，船翻屋倾。

洪涛、王恩宇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当时掌权的“红卫兵联队”一派的领导层成员，“红卫兵联队”的头头是吴传启、林聿时。

“吴传启、林聿时是学部哲学所的司局级干部。由于他们在文革前与关锋就是熟稔的老朋友，所以文革开始时他们能从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关锋那里得到最核心的机密，比一般人更能窥透当前的政治动向。…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有关锋甚至陈伯达、康生的幕后指导。……6月中旬，吴传启、林聿时推出潘梓年作牌位，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权。”（网摘孟祥才回忆录原载《历史学家茶座》，原题为“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

萧前非但与关锋关系密切，还传说是吴传启西南联大的同学，层层关系、渊源使萧前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一派系的“死党”、追随者，凡事向他们请示、与他们商量。这一派系的重要成员还包括《红旗》杂志的林杰。林杰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调干生，1961年《红旗》编辑部建立中国哲学史研究组，关锋为组长，林杰、阎长贵等四人师从关锋，进行中国哲学史研究。“王、关、戚”事件中“肇事”的《红旗》杂志67年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抓军内一小撮”）即为林杰起草。

此前，在萧前的引荐下，新人大社长赵桂林与上述各位“名人”都曾有过密切接触。

王、关倒台以后，学部与之有密切联系的以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学部的另一派组织根据戚本禹传达的周总理指示协助二炮保卫部追捕在逃的吴传启、潘梓年等人。不久，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被北京卫戍区收监，联队在各所的头头全都隔离审查。

王、关倒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旋即又演化成一波更大狂澜，关联派系的各群众组织被认定为五一六组织，他们的头头都被定性为五一六的坏头头。

1967年9月1日，陈伯达、康生接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首都部分红卫兵组织，发出：“对五一六组织的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专政机关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的指示，并提了一个名单，将林杰、赵易亚、《光明日报》总编穆欣定为反党小集团，将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等几十人都列入反党集团内，让革命派抓捕他们。

九月二日一早，因萧前被抓没了方向的新人大公社社长赵桂林匆忙赶到社科院民族所找王恩宇、洪涛商量对策。

1967年12月12日《人大三红》第57期第三版公布的九月二日赵桂林到社科院民族所找王恩宇、洪涛求援的内幕，就是在王恩宇被抓之后，9月26日“人大三红”去“提审”王恩宇时的“审讯记录”，内容如下：

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左右，赵桂林穿的兰色中山装到民族所三楼中间南面的房间里，我从里面睡觉出来，他说，你也在这里？他坐在沙发上，有洪涛在，还有民族研究所的几个同志。赵坐后讲：他们（指“人大三红”——编者）把萧前抓走了，打了一顿，打完后捆在门板上，打得半死，扔在外面，我们到地下水道找，也没找到。他们对我们攻得很紧，可能要砸我们，搞武斗，我们也得准备，我们把水池的铁棍子都拿来了，武装自己。洪涛说：是啊，也要象民院这样，搞武斗。赵说：我们也将把人员集中一下，占几个楼，准备一下，把我们的人组织一下。洪涛说：那你们自己办吧。赵又问：林杰的问题怎么回事？我说：我也不清楚，我们学部是不行了。我自己是挂在黑线上，我在考虑自己的问题。

赵又说：是不是大家串连一下，谈谈形势。

洪涛说：那你们自己串连吧！

我说：反正我们学部不行了，我们考虑自己的问题，我们不管了。

呆有二十分钟左右，赵就走了。他是怎么来的不清楚。

九月五日上午九时左右，洪涛说昨晚江青同志表态了，有的说江青同志说吴传启是陶铸式的人，有的说吴传启是陶铸的人，我说把问题弄清楚。他说昨晚开会人去的很少，人大两派都去了，我给赵桂林打电话问问，他就到另一个屋打电话去，不一会他回来说，赵桂林说是表态了，江青同志说穆欣是特务，吴传启是陶铸的人，萧前是特务，林杰是《红旗》一个小编辑，他的问题中央会解决。你们不要插手。

情况就是这样。王恩宇（签字）9.26

王的交待显示：萧前所依仗的关锋一派已经土崩瓦解，吴传启、潘梓年逃之夭夭，洪涛、王恩宇自身难保，赵桂林所言“我们也得准备一下，把我们的人组织一下。”实乃困兽犹斗而已。

五

9月11日新人大公社召开《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大会》，借“热烈欢呼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之机，找到说辞，把萧前说成是与陶铸一样的“反革命两面派”式的人物，借以与萧前斩断切割，脱身自保。会上，公社负责人张祖义代表总部指出“混进我们队伍中的萧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在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下，反革命两面派萧前的揪出，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也显示出我新人大公社无比坚强和巩固。以前由于我们警惕性不高，没有及时地识破萧前这个反革命两面派。今后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教导……”云云。

9月12日新人大公社召开斗争萧前大会，报道称：

九月十二日下午，新人大公社全体战士坚决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办事，满怀对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限忠诚、无比热爱；满怀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在公社委员会的组织下，召开了斗争三反分子、反革命两面派萧前大会，无情地揭露了三反分子萧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这个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也打击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妄图利用萧前问题打击我新人大的罪恶阴谋。（见1967年9月14日《新人大》报第四十期第二版）

对于萧前，新人大从九月一日的“拼死相救”，到十余天后的高帽子、喷气式伺候，唯紧跟而已。虽学着上峰“翻脸比翻书还快”的节奏，但置身于对立派的虎视眈眈之下，想洗脱干净又谈何容易！？就在该消息发布的同一天，《人大三红》第四十四期第四版通版刊载长篇揭发文章——“萧前与反党阴谋集团的若干罪行”，历数萧前与“新出笼的”反党集团的种种千丝万缕，细至每个事件、每次行程，甚至每通电话。呜呼哀哉！其文必为“叛”者所为。若不是身边近人、核心参与，哪能提供如此细密。

面临靠山倒塌的灭顶之灾谁都不得不绝地反击、重觅生路，没有那个会束手待毙、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反守为攻，寻找缝隙，将被操纵的帽子抢先套到对方头上。人大两派的武斗如同北京乃至全国各地两派激斗的情况一样，就是在这种内在逻辑的驱使下催生发展、逐步升级的。

文革中各单位两派组织的对立，由观点差异，到组织对抗，到你死我活，争的是什​​么？与其说是争权力，勿宁说是抢光环、避落水。光环就是争当紧跟伟大领袖的“革命造反派”，落水就是沦为死不觉悟的“反动臭老保”。为证明自己“响当当”、对方“臭狗屎”，双方开展抓人比赛，被抓的重点有三类人：

第一类、抓与失势高层有牵累的人。如9月1日“三红”抓萧前；

第二类、抓对方队伍中的所谓坏人。如11月11日新人大抓王昆顺；

第三类、抓对方骨干分子。如11月14日新人大抓谭立清。

波云诡谲，9月17日，刚刚勉强同萧前割裂的新人大，根据当时尚未抛出的戚本禹的指示，抢先把原在“三红”手中看押的孙决弄到自己一边审讯，意在抢功。未曾意料的是，10月6日孙决竟在新人大总部离奇死亡，这使得新人大弄巧成拙、雪上加霜。然而，就在萧前倒台、孙决死亡等一系列问题上频频被动之时，新人大竟也抓住了对方一些把柄，获得几次翻盘机会：其一，“三红”有反康生、反总理的“前科”。67年1月20日左右“三红”共同课鲁从明、寇金和等贴出过打倒康生的大字报，5月16日“三红”姚中原炮打周总理，这些都是可以重新翻出来戴上五一六分子帽子的。其二，67年10月20日“三红”欲结合的校级干部聂真突然被公安部门逮捕拘押，新人大认为是本派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胜利，遂即抓住了聂真在“三红”的代言人朱真，以求确证。其三，11月初新人大发现了“三红”的一个主要成员王昆顺的“五一六”嫌疑问题。新人大遂于11月11日诱捕王昆顺，给予“三红”猛力的还击。

关于诱捕王昆顺一事，1967年11月29日《新人大》报第五十期第四版“人大地下黑党委操纵人大三红总部挑起大规模武斗罪责难逃”一文有详细记录：

十月廿六日军委办事组关于“五一六”问题的指示下达后，我新人大战士立即行动起来，大家表示，下定决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揪出他们的黑后台，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

在经过周密调查，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继五月十六日揪出炮打周总理、谢付总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五一六”重要成员姚中原之后，于十一月十一日，又揪出了“三红”总部长长期包庇的“五一六”分子王昆顺、王英明，并抓住了“五一六”分子王昆顺。

“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王昆顺（原“人大三红”政治部主任，东方红公社负责人之一，是我校新闻系五年级学生，现“人大三红”新闻兵团负责人）、今年二月至六月调红旗杂志社工作。在他担任记者期间，来往于王力、关锋、林杰与北京第二外语学院“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张广武、吴昂等人之间。

今年五月上旬，曾以红旗杂志记者身份参加二外“五一六”分子串连会，以种种方式煽动和支持“五一六”分子大反周总理。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散布“周总理是张国焘的红人”，“周总理反对毛主席”等无耻烂言。胡说周总理在文革中折中、调和，搞机会主义。并多次以所谓揪陶铸的例子，煽动炮打周总理。充分的事实可以证明，王昆顺、王英明是今年五月份二外炮打周总理的策划者和煽动者，是不折不扣的“五一六”分子。

二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张广武、吴昂等人被揪出后，曾交待并揭发了王昆顺、王英明等人的反革命罪行，二外红卫兵早在两个月前就整理了王昆顺、王英明等人的材料，并通知了人大大三红总部，希望“三红”总部自己揪出王昆顺等人。但时至今日，“三红”总部在以聂真、崔耀先、朱真、铁华为核心的反革命地下黑党委操纵下，竟视若罔闻，说他们调查结果王昆顺等人不是“五一六”分子，竭力替王昆顺等人辩护，进行包庇。

为了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一月十一日，我新人大公社卫东兵团，采取了断然的革命行动，揪出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王昆顺，对他进行质问。

六

11月11日因新人大抓王昆顺在新闻系所在南一楼引发的两派间一场恶斗，是人大两派武斗第一阶段的高潮事件，两派报纸都有详细记录。

《人大三红》1967年11月23日第54期第四版“反动老保新人大总部有组织有计划挑起武斗大事记”中说：“十一月十一日晚新人大公社以所谓‘五·一六’分子的莫须有罪名，非法绑架了我三红新闻兵团战士王坤（昆）顺同学（自二月至七月在《红旗》杂志任记者，记者站过去、现在都认为王的表现是好的）。新人大公社总部主要负责人赵桂林、张祖义、唐玉琼亲自指挥，组织了几十个人，埋伏在西校门附近，卡车停放在万泉庄，派人骗王坤（昆）顺到西校门电话室接电话，把他绑架走。以陷害攻击三红。”

《新人大》报1967年11月29日第五十期第四版“人大地下黑党委操纵人大三红总部挑起大规模武斗罪责难逃”中说：“十一月十一日晚，他们出动大批人，头戴柳条帽，手持铁器、棍棒等凶器，把南一楼围得水泄不通，围攻我新人大新闻系同学宿舍，非法绑架了我新人大战士扈XX、徐XX、王宝刚（经济系三年级学生）及一名看门工人。在对上述几位同志进行一顿拳打脚踢之后，便于十二日凌晨一点钟把扈、徐、章三人绑架到“三红”总部，进行严刑毒打，用砖块猛击我新人大战士头部，用木棍狠捣他们的脊背，用铁棍打他们腰部，十几人轮流打嘴巴，踢腹部，使我新人大战士当场昏死过去。这样毒打一直达三小时之久，后放出扈瑞清、徐珠宝……”

“三红”围攻南一楼抓新人大三人毒打，显然是对新人大抓王昆顺的报复行动。

双方互抓对方队伍中的所谓坏人，抓出后大打战报。那一方队伍里坏人多，那一方自然是坏组织。关于自9月1日始至11月18日止两派之间的多次互打互抓，双方报纸都有详细记录。

据1968年6月《新人大》报第67期第二版“本报编辑部就人民大学文革若干问题答全国各地读者问”一文记载：

我公社坚持彻底革命大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去年到今年三月，连续揪出了潜藏在我校的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务、叛徒、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二百六十余人，其中人大三红的骨干、“优秀战士”和“革命领导干部”就有二百二十余人，占百分之八十五。

最近……我们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取得了四月大捷和开门红，仅在校内就从“三红”总部揪出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四十余人，其中包括操纵“三红”总部的地下黑党委的五个别动队——现行反革命集团，有一个是与台湾美蒋有直接联系、与地下黑党委二头目崔耀先和反共老手朱真有密切联系的全国性反革命组织。

至此，从“三红”中揪出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达270人左右，已占“三红”总人数的百分之十。

去年以来，我们也根据中央首长的指示，清除了钻入我新人大的坏人三十余人，纯洁了阶级队伍，巩固了组织。

据1968年6月8日《人大三红》第63、64期第二版“热烈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在人大的伟大胜利彻底砸烂操纵人大公社的国民党反革命集团”一文记载：

两年来，以人大三红和新人大公社革命造反联络站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向盘踞在我校的国民党反革命集团及其卵翼下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发动了持久的猛烈的攻击，稳准狠地打击了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辉煌战果。

截至目前为止，经过核实，人大共揪出阶级敌人254名，其中由我人大三红揪出的就达236人，占全部的92%。同时，我人大三红无产阶级革命派还从人大公社揪出《梭镖》、《万里长征》等××个现行反革命小集团，大力协助专政机关破获了数起重大反革命案件。此外，我人大三红也清除了混入自己队伍中的33名坏人。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人民大学的伟大胜利。

在我人大三红揪出的236名阶级敌人中，从人大公社正式成员中揪出的就占120多名其中包括副科长以上的‘领导干部’41名，‘教职员’59人，‘工人’21名。”

第三类、抓对方骨干分子。如11月14日新人大抓谭立清。

为了从气焰上打击对方、瓦解对方，双方互抓对方骨干分子，抓住后暴力教训，这是武斗中残酷血腥，加剧仇恨，致使恶斗不断升级的催化剂。

李德山回忆说：“（谭立清）是骨干，外联组组长。每次三红和新人大谈判，

他都是代表。谈了几次，口齿利索，口才好，外交能力强。”

在1967年11月29日《新人大》第五十期第三版“崔耀先的‘第三种势力’论和三红总部的‘和平颠覆’活动”一文中谈到了谭立清当时的情况：

“朱真等人从青岛回校后，立即向三红总部传达了崔贼关于争取‘第三种势力’的指示。九月十日，在三红总部核心组扩大会议上，朱真等人同三红总部主要负责人孔宪龙、刘庆库、安维华等人共谋如何执行崔贼指示，经研究后，决定在新人大内部制造反对派，搞策反活动。

经过一番策划后，“三红”总部作战部负责人谭××亲自出面，把他们早就打入新人大公社的内部的几个人拉出去，拼凑成一个以‘斗肖’为名，斗赵（桂林）为实的‘斗肖联络站’。于是，新人大内部的第一支‘造反大军’就分娩出来了。”

由于谭立清的得力策反工作，给新人的军心造成很大动摇，所以颇遭新人大忌恨，新人大就找机会抓住了他，并打得非常严重，听说“人已经废掉了”。又因为谭立清是“孙泐之死”专案组“三红”一方代表，他被抓被打以后新人大就被“三红”抓住把柄，说是新人大蓄意破坏调查，心中有鬼。（详见后《人大三红》1967年11月23日第54期第四版“反动老保新人大总部有组织有计划挑起武斗大事记”）

1967年的9月至11月底，两派之间抓人打人的情况两派都有详细记录，当然是张三说李四的，李四说张三的。《新人大》报记录的是：

在孙泐特务叛徒集团操纵下，人大三红总部……公开破坏革命大联合，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内战，他们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全面攻击我新人大公社。他们的高音喇叭竟一天广播十二小时以上，连续地谩骂攻击，……

他们疯狂地破坏“四大”，肆意撕毁我公社贴出的大字报大标语，割断我公社许多广播线。他们连续不断地寻衅闹事，挑起武斗，大打出手，企图用武斗挽回他们政治上的失败，几次组织人冲击我公社总部。他们非法绑架我新人大战士，私设刑堂、严刑拷打，逼问我新人大总部工作人员的名单和专案组人员的名字，竟强迫写认罪书；仅从10月6日到9日被三红中一小撮暴徒非法绑架、严刑拷打的新人大战士就达20余人，大部分被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死去活来。（见《新人大》1967年10月29日第四十八期第二版“人大三红总部休狂”）

十一月十二日中午，在东风二楼农经系同志住处，三红出动数十人，非法绑架走我新人大农经系战士李亚模，当我部分战士赶去抢救时，遭到这伙人的毒打。

十一月十四日中午，我新人大新闻系战士林长青、田润光两同志在经济系食堂买饭回宿舍，半途就被三红一伙事先埋伏好的人打碎饭碗，抓入南一楼。他们头戴柳条帽手持凶器，准备大干，我新人大战士闻讯后去了二十余人，在六处一排前向他们喊话，希望他们立刻释放我新人大战士。他们不仅不予释放，反而出动西面几个系的全部三红打手，向我战士扑过来，与此同时，三红广播台又大叫大嚷，从东边几个系调来二百余名全付武装的打手，跑向南一楼，进行武斗。为了避免事态扩大，我公社战士当即撤回。

但是，这群流氓打手（共约三百余人），在三红总部坏头头刘庆库和三反分子付秋涛的女儿付民族的亲自指挥下，疯狂袭击我新人大历史系同学的住处——五处，他们见人就打，砸破了五处大部分门窗，抢劫所有的财物，包括被子、衣服、钱、粮票，手表、箱子、资料等等，使国家财产和个人财物，受到严重破坏和损失。接着，他们又袭击我新人大广播台所在地北一楼和北二楼。

在此过程中，这群暴徒，对我新人大战士进行了残酷野蛮毒打，惨绝人寰，目不忍睹。请看事实。

我新人走战士王力生（经济系二年级二班同学），赤手空拳，在北一楼前被三红政治部负责人韩崇勋（国政系三年级学生）用三尺长二、三寸宽的大刀猛砍三刀，头骨被砍裂，身上的棉衣、绒衣被砍透，臂彼砍伤，鲜血浸满衣服，当场被砍倒住地上，有生命危险。

新人大女战士隋木兰（经济系一年级一班同学），被三红一伙打手抓住后，先提着隋转了几圈，待隋昏倒在地后，用脚猛踩隋的乳房和下身，当场踩出小便，并踩昏过去，内部受伤，现伤势极为严重。

新人大战士洪登书（历史系同学）被三红一伙打手抓住以后，一顿毒打，便按住洪登书同志（下转二版）头部往人工湖水里溺，企图把洪登书同志溺死。后又往南楼拖，进行毒打。

我新人大战士、修建科工人殷牛，在五处一排看到我战士被绑架、毒打，他前去解救，被三红一伙打手，用棍棒猛击头部，当场昏倒，鲜血直流，这

伙打手还不甘心，在已昏死的殷牛同志头上、身上，又狠狠地打了若干棍，现殷牛同志卧床不起。

我新人大战士、修建科工人王德林，配电室工人赵玉智头部均被打破重伤，配电室工人刘绍丰同志腿打得不能走动，计统系同学王敏达同志生殖器被打坏，睾丸被打肿，不能走动，卧床不起，工人张聚嘴被打坏、重伤，历史系同学古火金头被打破，眼部被打重伤。

这群暴徒在洗劫五处、冲打北一楼以后，便回各系，继续行凶，在东风楼财贸系，我战士练优芳吃晚饭，就被三红一伙打手绑架到宿舍，手被打破。我几名战士去抢救，也未能幸免。计统计系鲁东原同志晚上回东风三楼睡觉，刚进屋，就被三红一伙打手抓去，一顿毒打。

十一月十五日早晨，在东风一楼工经系宿舍，三红一伙打手，又强行绑架我新人大战士、工轻分社负责人梁志玉同学，一面毒打，一面强逼梁志玉同学写所谓“认罪书”，手段极为卑鄙。

据不完全统计，在三红挑起的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中，我新人大战士被打伤五十多人，其中重伤近二十人。国家财产遭到很大破坏，五处共六排近百房平间（间平房），大部门窗、电灯、家具被破坏，新人大公社的资料和战士个人财物被抢劫；许多战士除只身一人外，衣被财物全被抢光，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在三红总部一手制造的白色恐怖下，我新人大战士数百人无处居住，都拥挤在总部大楼。为保证将我校文革进行到底，部分被三红无理赶走的新人大战士决定搬到红一楼我新人大战士的房间去住。

十一月十六日下午，我部分新人大战士刚进红一楼，该楼的三红战士就无理挑衅，不让我新人大战士进红一楼。此时，三红广播台大叫大嚷，大肆进行煽动，调动数百名三红战士手挥大刀长矛把红一楼围得水泄不通，打伤我战士，并用砖头石块冲砸红一楼，扬言要把我们‘消灭干净’。这次武斗，三红一小撮暴徒又打伤我战士数十名。”（见1967年11月29日《新人大》报第五十期第四版“人大地下黑党委操纵人大三红总部挑起大规模武斗罪责难逃”）

七

《人大三红》报记录的是：

新人大公社社长赵桂林、作战部副部长黄达等不断挑起武斗。据不完全统计，从九月初至十月底，新人大公社共挑起十一起武斗，打伤我人大三红战士三十三名。绑架了亮相在人大三红一边的革命领导干部朱真同志，砸了我三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首都揪邓联络站、首都哲学批判联络站、三红法律兵团资料室、经济兵团资料室。

十一月一日中午新人大公社数十名工人、学生、教员在职工食堂绑架并毒打三红战士肖明，并抢走十余元钱。三红战士闻讯赶到，救出肖明，撤退时，新人大公社又调来近百名手持铁棍、木棒的打手，用砖头、煤渣块砸伤我三红战士多人，重伤五人，其中站在一旁观看情况的我研究所三红战士王朝文被他们用石头、木棍把头部打破五个窟窿，露出头骨，当场不省人事，另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工人、三红战士张起瑞从医院看病回来路过此处，被他们用煤块把头砸破，在医院动手术时，煤渣陷进很深，见到头骨。与此同时，我三红战士张扬同志由商店买菜回家，走到二处六排，被新人大公社武斗干将、被我公安部拘留过的大流氓葛占圈率领一批打手围住殴打，张扬同志的小孩及路过的附中红旗战士因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也被殴打，葛还叫嚷：‘什么他妈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公然侮辱我们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下午一时半，三红国政兵团战士卢锁岭同志路过原图书馆北门，又被葛占圈拦住殴打，当场昏迷过去。二时许，新人大公社调集数十名社员用大杠将我三红工人宿舍二处一排大院西墙二十余米全部推倒，将砖头运至北五楼，并将三红战士宿舍玻璃全部打碎。当三红战士前往劝阻时，又遭毒打，三红战士张桂荣、张宴宾等被打伤。六时半左右，新人大公社在城内铁一号的四十余人预先埋伏好，当由西郊开去的交通车一到达，他们就蜂拥而上，

毒打刚下车的三红战士，蒋培坤同志被打昏，吴贵庆同志被打重伤。之后，又将我三红住城内联络站工作人员赵剑敖同志拖出毒打，并纠集一伙人，到三红战士宿舍前叫骂，打碎玻璃，进行威胁。

十一月二日新人大公社撕毁了十一月一日卫戍区同志主持双方总部达成的关于采取措施不再挑起武斗的协议，又挑起武斗事件五起。再次洗劫三红政法兵团资料室、档案兵团‘春雷’办公室，打伤我三红战士数人，重伤

一人，轻伤二人，非三红战士一人，其中，档案系三红战士冯乐耘的小腿被打成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函院教员万钟民（非三红战士）仅因在新人大老巢北一楼前马路上散步，便遭绑架毒打，从下午四点一直打到六点，并威胁说：‘你不老实，我们开水马上浇好，烫你的屁股。’‘我们还有电刑，给你过电’‘你是下午来的让你活着出去，如果上午来就别想活着’。打完后，又威胁万钟民说：‘我们没有打你，今天抓你是革命行动，你出去如果造谣污蔑，小心你的狗头！我们新人大打狗队，专打你们。’”

十一月三日晚新人大公社策划组织四百人冲砸三红总部办公楼。因对行动时机有分歧，当夜没有动作，新人大公社扩大武斗班子，编为三队，一队是数十名工人组成的“巡逻队”，完全脱离生产，集中在新人大总部居住，白天睡觉，夜间活动，他们头戴柳条帽，眼戴铁丝编的防护镜，口戴大口罩，身穿厚棉衣，手持长矛铁棍，对三红进行偷袭；一队是数十名学生组成的‘棒子队’，集中在新人大总部居住，全副武装，专门搞武斗；一队是‘红色少年大队’，专门打砸抢。当天，新人大公社办公楼还进行了消火栓喷水演习，并运石灰等武斗物品。

十一月四日晚新人大公社三次袭击六处三红宿舍，一次袭击二处一排和三排三红宿舍。

十一月五日下午，新人大公社后勤部长赵钰（原伙食科长）领人去修建科铁工组赶制长矛、大刀和匕首。晚上，新人大公社袭击二处一排和林园楼三红宿舍，洗劫三红经济系和农经系办公室、资料室。

十一月十二日晚新人大公社砸抄了我三红国政兵团的两间办公室。

十一月十四日中下“孙泱之死”联合调查组三红首席代表谭立清同志接到家电噩耗，上系秘书处办理回家路费手续，路过文化革命广场，被新人大公社突然绑架，遭到新人大非法审讯和严刑毒打，用橡皮裹住身体猛打，不留痕迹，谭遍体鳞伤，昏迷不醒，经医生多次会诊，半身已瘫痪，脑缺氧，水肿，数次窒息，生命垂危。下午二时，新人大又绑架了三红函院兵团战士张阁林同志至北二楼，剥光衣服，蒙住眼睛、吊起来轮番拷打，并用开水烫背，然后用凉水冲。随后将张丢在马路上，张全身血肉模糊，两腿寸步难行。下午四时，新人大公社又调动数百名战士，手持铁棍木棒，袭击我三红新闻、经济等兵团战士宿舍，打伤我战士四十三人，重伤者十五人，其中住院七人；同日又抢劫我三红工厂工人自用自行车七辆，在路上劫抢三红经济灶炊事员

自行车一辆。

十一月十五日晚七点半，三红农经兵团战士张玉振、何天福去急诊室看病，被二十三名埋伏好的新人大暴徒打倒在地，蒙上眼睛，拖到北二楼毒打，何、张被打得四肢不能动，张随身带的二十八元人民币和笔记本也被抢走。同日晚，新人大暴徒冲入函院兵团战士龚维丽（女）家，数人用强光手电刺她眼睛，其他人用乱棒毒打。同日晚十一点多，一群新人大暴徒又砸破函院教师邝鸿的门窗，用乱棒毒打邝鸿夫妇二人，邝当场昏倒在地。这群暴徒骂邝‘装死’，又将邝拖至北五楼，狂叫：‘你小子还未死’，又毒打了一顿，邝头部被打破，脚趾骨被打断。同日晚，新人大一群暴徒抄了三红战士李华、崔今是同志等十几户的家，把他们强行赶走，这些战士至今无家可归，衣食无着，我三红战士崔今是六十多岁患有癌症的母亲（崔不在家）亦不能幸免。

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四时许，新人大公社调动五、六十名暴徒，头带柳条帽，手持铁棍、木棒，配合事先埋伏于楼内的数十人，强占红一楼（教工宿舍，内住三红战士及其家属一百余人，位于学校东大门左侧），企图控制学校大门，并对三红总部大楼形成包围圈，割断东风楼和林园、一处、二处三红战士连系的通道，以便对各住区三红战士各个击破，最后围攻三红总部大楼，他们一进楼，便安装电话，以便听新人大总部指挥，他们事先通知住在红一楼的历史反革命傅介声搬家，新人大还帮他搬，并护送大右派吴景超搬出红一楼。随后，新人大公社又增调数十名暴徒，运进大量砖头、瓦片、煤渣，把楼门堵死。十五日遭新人大毒打成重伤的函院教师邝鸿，刚从医院回来住在红一楼，这时又被新人大关押、毒打，人大三红战士时运凯的爱人从东北来到北京生孩子，产后只有十七天，大人小孩身体均很弱。可是，这群法西斯暴徒兽性大发，连生产只有十七天的孩子、大人都不放过。破门闯进“月房”，大开消防用的水龙，喷射冷水，满地灌进二寸深的冷水，冻得大人小孩浑身发抖，娘俩个又惊吓又冷，都得了重感冒。当卫戍区的解放军同志把产妇背出来之后，产妇的爱人想再进去拿些小孩和产妇的日常用品，新人大的一小撮坏头头开头就问是‘新人大’的还是‘三红’的。一听是三红的就坚决不准进去。红一楼内三红战士宿舍全部被砸，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人大三红战士闻讯赶到，新人大暴徒从高处用砖头、瓦片、煤渣砸我三红战士又用消防水龙头冲。楼里灌进几寸深的冷水，水里通电，接着，新人大公社又调来数百名打手，安装探照灯，开来土坦克（用汽车改装，装置铁板）

作掩护，向我三红战士发动数十次进攻，三红战士被打伤二百二十人，重伤四十五人。

十一月十七日晚，人大三红和新人大在卫戍区同志主持下谈判，就在谈判过程中，新人大坏头头指挥新人大棒子队、少年流氓大队，抄砸六处我三红战士宿舍，发生武斗。

十一月十八日在卫戍区首长的主持下，人大三红和新人大双方达成了‘制止武斗协议’。但协议墨迹未干，新人大公社的坏头头黄达、赵桂林之流就伸出黑手，一把把它撕毁。当晚，黄、赵指使一批暴徒，明目张胆地砸毁了住在二处三排九号、十四号、十九号，北四楼下八号的三红战士宿舍，并对这些三红战士进行了残酷的毒打。十时后，黄、赵派出部分暴徒，强行进驻林园一、三、七、九楼。深夜至凌晨，新人大一批暴徒连续袭击我三红六处六排学生宿舍。连日来他们不断派人对我三红进行骚扰，在光天化日之下，惨无人道地毒打我三红战士制造流血事件。”（《人大三红》1967年11月23日第54期第四版“反动老保新人大总部有组织有计划挑起武斗大事记”）

八

一时间校园内血雨腥风，两派同学都不可能再在自己本班本系原来的宿舍混合居住了。以共青团路为界——“三红”一派学生、教职员集中到了学校的南侧，教学大楼南面的南楼等处居住；新人大一派学生、教职员集中到了学校的北侧，图书馆大楼北面的北楼等处居住。

在“一一·一一”三红围攻南一楼、“一一·一六”新人大攻占红一楼两次严重武斗事件之后，十一月十八日在卫戍区的主持下，双方签订了制止武斗协议，协议的要点有：双方无条件地“拆除全部武斗工事”“交出一切武斗工具”“不准以任何借口抓对方的人”“已抓者一律释放”“一律搬回原单位、原住处和原来办公位置”“恢复到今年八月份的情况”……

但是，在两个山头依然同样被中央文革认可，两“大王”仍旧同存并立的情况下，协议无从落实。两山头各自为政，群众各听各派。除暂时释放了已抓“战俘”、交出了部分武斗工具之外，两派师生员工并未“搬回原单位、原住处和原来办公位置”。至11月底，割据基本定型，“楚河汉界”势成，为今后的武斗进一步升级摆开了战场。❏

【读者来信】

金冲及与高文谦

——史料与史观

孙言诚

我读大学时，金冲及是讲师，教我们近代史，朱永嘉是助教，辅导陈守实先生的课。二位是我师长，学问扎实，思想深刻，我终生敬重，不敢丝毫怠慢。但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二位的授业、解惑，没得说，一流。但所传之道，历经几十年生活，不敢苟同。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说两司马。论材料的可靠，迁不及光，论见识的高低，光不如迁。盖一为官修、一为私撰也。两人的高下不在史料，而在史观。光是为帝王提供治国经略，迁是发泄胸中的块垒。司马迁之所以千余年来备受尊崇，不是他说的究天人之际，他究不了，而是他对君王的藐视。他把项羽纳入本纪，就是在汉高祖头上立了个太上皇。他把项羽描写成盖世英雄，把高祖写成猥琐的流氓，拒绝写今上（武帝）本纪（现在的本纪是用封禅书顶替的），不管有多少不合适的地方，但都显示了他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再来谈谈金老师和高文谦写周。金说高的史料是真实的，我想高也一定会说金的史料是真实的。金认为高的问题出在史料与史料之间的推测，这其实说的是史观。在这方面我认同高，因为不管有多少不足，他是独立的。金说的再周全，他是官方的。金的书邓颖超满意，党的领导人满意，高的书上述人是绝对不会满意的。但后人满意哪本，不好说。举个例子：批周会。高写出了攀龙附凤小人物的卑鄙和尴尬（毛把责任推给她们），也写出了毛、邓、周之间的微妙关系，也许观点不一定准确，但总比把会议记录一火焚之，对历史更负责。

我理解金老师的良苦用心。他的毛传把论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的修改过程，逐次逐次地写出来，无非是想让人们认识伟大领袖从鼓吹鸣放到坚决反右的言论转变。其实，只要把当年在复旦我们听的录音报告和发表的文本一对比，中学生也能明白，用不着如此大费周章。这就是“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的差别。范先生提到了年谱，是的，年谱很有用，但比《通鉴》还是差得很远。现在是连通鉴也不让写了，大家只能读袁克定给他爸爸编的《顺天日报》。

我理解金老师，高在北京时写的文章远远不如金老师。理解归理解，苟同是不可以的。❏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

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選摘、引用本刊文章，請注明出處